

目 录

-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努力搞好冠县文史
资料工作……中共冠县县委书记李耀亭（1）
- 冠县建置沿革……郝瑞琛 许正坤（7）
- 冠县县委、政府人事沿革序列
……党史办公室（17）
- 冠县党组织的创建及其活动
……党史办公室（24）
- 对冠县八年抗战的回忆……马景汉（38）
- 壮烈殉国，浩气长存——卫河支队六十
二烈士英雄事迹纪实……刘文科（63）
- 冠县回族人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中的贡献……民侨宗办公室（75）
- 孙立民传略……党史办公室（79）
- 记第一任“柏江队”队长王登铭
……党史办公室（87）
- 回忆先父李一香……李荫川（93）

“血水井”惨案·····	党史办公室	(100)
冠县抗日游击高小始末		
·····	教育志办公室	(108)
李雪亭和他的乡土教材·····	马子江	(119)
冠县回族简史·····	民侨宗办公室	(130)
宋景诗传略·····	摘自“宋景诗调查记”	(133)
武训与崇贤义塾·····	郝瑞琛	(155)
五位学者论武训·····	政协办公室搜集	(172)
回忆我父亲——查拳名师张英振		
·····	中央歌舞团张铜霞	(182)
一曲《颂升平》 欢表老人心		
·····	政协办公室	(201)
漫话肖城·····	韩正居	(206)
喜闻乐看的民间剧种——蛤蟆喻		
·····	周月岐 邱东山	(211)
冠县部分文物及说明·····		(216)
冠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征集史料		
提纲·····		(219)

~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

努力搞好冠县文史资料工作

中共冠县县委书记李耀亭

在冠县全面改革，开拓进取，满怀信心建设四化的大好形势下，《冠县文史资料》第一辑现在出版了。这是文史资料委员会和有关部门通力协作，有关同志含辛茹苦、精心编纂的结果，不仅是我县文史编纂工作中的一项丰硕成果，也是冠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早在一九五四年四月就提出要征集、整理、编写近代史，现代史资料，出版《文史资料选辑》，传之后代。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同志在讲话中也指出，“文史资料工作部门是生产精神财富的工厂，……”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一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章程》中也明确地提出了地方委员会要编选文史资料的任务。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上承祖宗、下启子孙，服务人民，服务四化建设的一项光荣事业。努力搞好文史资料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撰写文史资料，它既弥补了历史文献之不足，又为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文艺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为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提供了生动的教材，也可使撰写者温故知新。同时，在继承发扬文化遗产、加强同各界人士的联系、促进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等方面也必将起积极作用。在“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的今天，重展历史画卷，也必将大大激发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为搞好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才智和力量。

冠县位处鲁西北平原，历史悠久，文化发

迭，史料丰富。近百年来，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冠县人民为追求真理和解放，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土地革命斗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光辉历史，涌现了许多功绩卓著的历史人物，出现了闻名遐迩的历史事件。在抗日战争时期，冠县是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曾被称为“鲁西北的小延安”，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过很大贡献和巨大牺牲，培养锻炼出一大批有影响、有威望的革命干部。“六十二烈士墓”，就是冠县人民抗日救国光荣历史的有力见证。勤劳、勇敢的冠县人民在自己的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工作、斗争、谱写着一曲曲壮丽的凯歌，描绘着一幅幅宏伟的历史画面。把这些史料征集撰写成文，是历史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是文史资料工作的方向。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崇高美德，是保卫和建设祖国的精神力量。文史资料工作就是组织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撰写史料，这一工作的本身就加强了同各界人士的联系。通过撰写史料，促进他们总结自己的经历，明辨历史是非，认清真理，进而为促进团结进步事业和国家的繁荣昌盛而努力。通过整理史料，来调动各方面人士的爱国主义热情，使他们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为振兴繁荣冠县经济贡献自己的力量。

搞文史资料工作，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复告诫我们，做文史资料工作要严肃认真，“要存真，要实事求是。”史料就要放在历史的条件下来叙述。史料情况错综复杂，因此，我们搞史料，就不能简单化，要认真搞好调查

研究，弄清事实真相，分清是非功过。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力求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不溢美，不贬损，存真求实，秉笔直书。搞史料，还要彻底肃清“左”倾思想的影响，以正确的态度和观点来撰写史料。使冠县文史资料真正成为一部信史，起到应起的作用。

征集编纂文史资料工作，已刻不容缓，一定要有紧迫感和责任感。我县许多珍贵史料的知情人和革命老干部，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业已作古，有的年事已高，如不抓紧“抢救”，则势必人去史亡，失之交臂，铸成大错。年事已高的仁人志士和革命老干部的亲身阅历，耳闻目睹的史料，是我们冠县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下大力挖掘、整理。要切实重视起来，否则，后悔莫及，损失无法弥补。编纂文史资料，涉及到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求编纂的同志，要有高度

负责的精神，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后代负责，要严格审核，认真鉴别，精选精编，严把政治关、史料关、文字关，以防谬种流传，贻害后人。

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源远流长的光荣事业。要建立一支热心的全心全意致力于文史工作的专业队伍。政协等有关部门，要选拔培养一些具有一定历史知识和文学修养，懂得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熟悉社会生活，热心此项工作的同志来致力于文史资料工作。切实把这项工作搞好。

让我们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携手并肩，共同努力，把我县的文史资料工作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

冠县建置沿革

郝瑞琛 许正坤

冠县位于山东省西北部，地处东经 $115^{\circ}16'$ — $115^{\circ}46'$ ，北纬 $36^{\circ}22'$ — $36^{\circ}41'$ 之间。南接莘县，东临聊城，北与临清接壤，西南与河北省大名毗邻，西靠漳卫河与河北省馆陶县隔河相望。全境东西最大横距45公里，南北最大纵距34.8公里，总面积1152平方公里。1983年计有耕地117.18万亩。

冠县县境属黄河冲积平原，海拔36——42米，西南较高，东北偏低，坡降为 $1/1000$ —— $1/7000$ 。汉代遗留下来的黄河故道（今沙河）呈西南东北走向，贯穿县境。由于历史上黄河改道，形成全境波状起伏地貌。河滩高地和缓平坡地，占总面积的90%左右。

冠县地方唐、虞、三代为冀州之域，确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见春秋。春秋时为晋冠氏、黄邑。冠氏邑在今南馆陶东东古城。《左传》载：周敬王19年（前501年）晋人伐卫，“齐为卫故，伐晋冠氏。”黄邑系今冠县城南黄城村。《史记》载：周威烈王十三年（前413年），田庄子相齐宣公。宣公43年伐晋，毁黄城。《括地志》云：故黄城在魏州冠氏南10里，因黄沟为名。战国时期属赵国。

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前221年），废封建，为郡县。冠县地方属东郡。

汉（前206——公元220年）初置馆陶县，因其城西北七里有陶丘，赵置馆于其侧，因名馆陶。属冀州魏郡。《汉书·地理志》载：魏君高帝置，属冀州县十八：邺、沙、魏、斥丘、内黄、馆陶、清渊、元城、繁阳、黎阳、梁期、即裴、平恩（侯国）、邯会、邯沟、武

安、武始、阴安。《山东通志·古迹》说：馆陶县治今南馆陶（东古城）。清渊城在今北馆陶西北18里，俗曰清阳城。

公元220——265年，曹魏统治中国北方。馆陶、清渊属司州阳平郡。《山东通志·卷十八》载：黄初二年以魏郡东部置阳平郡于馆陶，隶冀州领县八。黄初六年封馆陶王霖为东海王，馆陶县改称馆陶王国，太和六年复为馆陶县。

晋（265——420），馆陶、清渊属司州阳平郡。《晋书·地理志》载：阳平郡，属司州，统县七：馆陶、清泉（唐人写《晋书》为避高祖讳改清渊为清泉）发干、阳平、乐平、东武阳、元城。

南北朝时期（420——589），馆陶、清渊仍属司州阳平郡。《山东通志·沿革表》载：北魏将清渊县治移至今冠县清水堡，齐周因

之”。“北齐省发干入清渊”“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于馆陶置毛州，馆陶县、州、郡治”。

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始置冠氏县，（因古冠氏邑而得名，治今冠县城），迄今已有1399年的历史。《冠县县志·地舆志》引《元和志》云：“冠氏县西至魏州60里，本汉馆陶县地，开皇六年析馆陶东界置，因古冠氏为名，属毛州，大业二年州废，改属武阳郡”。

唐（公元618——907年），改郡为州。地方行政体制为道、州、县三级。唐初冠氏县属毛州；贞观元年废毛州，改属魏州河北道。《唐书·地理志》载：魏州属河北道，领县十。《续山东考古录·卷五》说：“唐初避高祖讳改清渊为清水，属毛州。贞观元年省，入冠氏为镇。”

五代（公元907——960年）时期，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相继统治中国，其行政设置沿袭旧制，仍属魏州，均为冠氏县。

宋金时，公元960年赵匡胤结束五代十国乱局，建立宋朝，分天下为十五路，冠氏县属河北东路大名府，魏郡。公元1141年宋金和议后，冠氏县属金代大名府路大名府。

元朝（公元1279——1368年）在我国历史上疆域辽阔，为适应中央集权的有效统治，在中央设置中书省，作为全国最高的行政机构。全国分置了十一个代表中央中书省在地方行使职权的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大都（今北京）附近的河北、山东、山西地区叫做“腹里”，都隶于中书省。金冠氏县属大名府。元初属东昌路，至元二年升冠氏县为冠州。直隶中书省。（见《续山东考古录·卷五》）。

明（公元1368——1644年），将行中书省

改为承宣布使司，简称布政司。明洪武三年（公元1369年）元冠州降为县，始定名冠县属山东布政使司东昌府。西北有卫河，东有贾镇堡，东北有清水堡，俱嘉靖22年筑。

冠县东西广50里，（南北）袤55里，东至堂邑高庄铺35里，西至馆陶界唐寺村15里，南至朝城界荆楼20里，北至馆陶万善村25里。固献镇距县北100里，卫河之北，越馆邱二县，与广宗、威县、临清等处犬牙交错，说明“河北冠县十八村，明已属冠县”。成化年间始筑冠县砖城，万历22年“工乃大备”。见旧《冠县县志》（万历己酉）。

清（1644——1910年），因旧制，分全国为18省，后增至22省，冠县属山东省东昌府。全县330个村，分为四乡（崇文、奔山、清渊、博陵）27里，266甲。冠县元明时代户口最为稀少，清初则逐渐增加，乾隆年间为最

盛，全县编户25018，丁口202359（见1934年《县志》）较明万历时增长3.8倍。

民国元年（1912年）废府设道，冠县属山东省济西道，次年，改济西道为东临道，冠县属山东省东临道。17年道废，冠县直属山东省。25年（1936年）设督察专员公署，冠县属山东省第六督察专员公署。民国时期全县九个区：城关、谷子头、白塔集、桑阿镇、张庄、谈二寨、化村、清水、干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在冠县的政权瓦解，成立了抗日政府。从1938年到建国前，冠县政区变革八次：

1938年下半年——1940年春，冠县属鲁西北行政委员会，九个区。

1940年春——1941年冬，冠县改属冀南三专署，八个区。九区干集划入河北省。

1941年冬——1942年冬，冠县仍属三专

署，十三个区。

1942年冬——1943年夏，冠县改属冀南七专署，八个区。

1944年夏——1945年8月，冠县又改属冀南七专署，五个区。1943年冬，冠县一、七、八区与馆陶一、七区合为永智县（因纪念1943年10月21日在清平县陈官营战斗中光荣牺牲的冀南七分区政委肖永智同志得名）。冠县六区划入武训县。

1945年8月——1946年3日，仍属冀南一专署。1945年8月12日永智县与冠县合并，仍称永智县。同年冬，六区由武训县归，年底复冠县，设十个区。

1946年3月北馆陶、南馆陶回归馆陶县，冠县恢复原来的八个区。1949年8月，冠县属平原省聊城地区，设城关、梁堂、桑阿镇、张庄清水五个区。

建国后，1952年11月15日撤销平原省，冠县改属山东省聊城地区，设六个区（增加化村区）八十一个乡。

1956年3月6日撤销堂邑县，其辛集、柳林两区和温集区的定远寨、范王庄、黑周三个乡入冠县。全县八个区、七十四个乡。

1958年2月5日撤区设二十个乡。当年秋成立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馆陶县和莘县的燕店、王奉两社并入，时全县共十六处公社；城关、史村、清水、桑阿镇、贾镇、辛集、燕店、王奉、柳林、北馆陶、魏僧寨、潘庄、八岔路、南馆陶、柴堡、房儿寨。

1961年10月5日冠馆分治，燕店、王奉两社回莘县，公社改区，全县七个区：城关、梁堂、桑阿镇、清水、贾镇、辛集、柳林共辖五十二处小公社。

1965年3月29日馆陶县的南馆陶、北馆陶

两区复入冠县，增加到九个区，六十一处小公社。

1971年1月16日撤区。全县分十八处公社：南陶、斜店、北陶、清水、甘屯、柳林、范寨、辛集、兰沃、店子、万善、孙町、烟庄、贾镇、定远寨、桑阿镇、梁堂、城关。

1984年9月7日撤销公社，改建为七镇十五乡。七镇：冠城镇、东古城镇、北馆陶镇、清水镇、柳林镇、贾镇、桑阿镇。十五乡：甘屯、兰沃、店子、万善、孙町、范寨、辛集、烟庄、定远寨、梁堂、斜店、杨召、史庄、元造户、白塔集。

冠县县委、政府人事沿革序列

党史办公室

中共冠县县委书记沿革序列

(一)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36年夏初—1937年7月)

(1) 中共冠县党支部(张家庄支部)
书记: 王维羣 (1936年夏初—1936年秋)

(2) 中共冠县工委
书记: 王维羣 (1936年秋—1936年冬)

(3) 中共冠县县委
书记: 王维羣 (1936年冬—1937年春)

(4) 中共冠县中心县委
书记: 王维羣 (1937年春—1938年8月)

(二)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

1945年8月)

(1) 中共冠县县委

书记：郭芳臣(代) (1937年8月—
1937年10月)

(2) 中共冠县临时工委

书记：赵健民(兼) (1937年10月—
1938年2月)

(3) 中共冠县临时县委

书记：郭英 (1938年2月—1938年5月)

(4) 中共冠县县委

书记：许梦侠 (1938年5月—1939年6月)

郭林业 (1939年6月—1940年3月)

王志浩 (1940年3月—1945年8月)

肖平(代)(1942年8月—1942年10月)

(三) 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
1949年10月)

(1) 中共永智县委(中共冠县县委)

书记：孙洪（1945年8月—1946年2月）

（2）中共冠县县委

书记：杨立功（1946年2月—1947年10月）

马景汉（1947年10月—1948年2月）

苏刚（1948年2月—1949年2月）

曹子丹（1949年2月—1949年7月）

（四）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17年

（1949年10月—1966年5月）

中共冠县县委

书记：田坡（付）（1949年7月—1950年2月）

李德忠（1950年2月—1954年4月）

刘坚（1954年4月—1957年4月）

陈光汉（1957年4月—1958年11月）

韩哲（1958年11月—1960年6月）

孔华轩（1960年6月—1967年3月）

（五）“文化大革命”的10年

（1967年3月—1976年10月）

孔华轩 (1972年11月—1975年1月)

魏景山 (1975年1月—1976年12月)

(六)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1976年10月

孙刚纪 (1976年12月—1978年11月)

耿善亭 (1978年11月—1982年11月)

李耀亭 (1982年11月—)

冠县县长沿革序列

(一) 抗日战争时期 (1938年1月—1945年8月)

(1) 冠县抗日政府

县长：张维翰 (1938年1月—1938年4月)

冉光耀 (1938年4月—1939年2月)

张廉芳 (1939年2月—1939年6月)

王化云 (1939年6月—1940年3月)

(2) 冠县抗日民主政府

县长：马景汉 (1940年3月—1940年冬)

苏 羣(代) (1940年冬—1941年秋)

马景汉(代) (1941年秋—1946年秋)

(二) 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1949年9月)

(1) 冠县人民政府

县长: 王相卿(代) (1946年3月—1946年10月)

宋惠然(代) (1946年10月—1947年9月)

梁文焕 (1947年9月—1948年2月)

崔 强 (1948年2月—1949年2月)

杨恒一 (1949年9月—

(三)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17年

(1949年9月—1967年3月)

(1) 冠县人民政府

县长: 杨恒一 (1952年5月离职)

刘 坚 (1952年5月—1954年4月)

李柏华 (1954年4月—1958年12月)

路子平 (1958年12月—1961年7月)

(2) 冠县人民委员会

县长：翟良图 (1961年7月—1964年5月)

高士贵 (1964年5月—1966年5月)

(四) “文化大革命”的10年

(1967年3月—1976年10月)

冠县革命委员会

主任：高士贵 (1967年3月—1968年9月)

王合东 (1968年9月—1970年7月)

赵新三 (1970年7月—1972年8月)

孔华轩 (1972年11月—1975年3月)

魏景山 (1975年6月—1976年11月)

(五)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1976年10月—

(1) 冠县革命委员会

主任：孙刚纪 (1976年12月—1978年11月)

耿善亭 (1978年11月—1981年12月)

(2) 冠县人民政府

县长：张瑞信 (1981年12月—1984年3月)

李秉忠 (1984年3月—1986年4月)

石金铭 (1986年4月—

冠县党组织的创建及其活动

党史办公室

“九·一八”前后冠县的形势

山东省冠县，古称冠氏县，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发较早的县份之一。它位于冀鲁豫三省结合部，地薄人穷，加之统治阶级的剥削，人民生活极端贫困。为了摆脱黑暗和贫困，仅在近代，这里就曾出现过以宋景诗为首的五大旗起义，1898年“山东冠县十八村”（现属威县）义和拳反帝斗争。这充分表现出冠县人民的反抗精神，对以后的革命斗争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民国后，全县12000顷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地主手里，其中二十几家大地主构成全县的农业和经济重心，盘剥和压榨劳动人民。贫苦农民不得不走京（北京）串卫（天津）闯关东

（东北）下口外（内蒙）谋生。“七·七事变”前的党员姚汝安、郭英、郭林业等就是沦落异乡后入党参加革命的。蒋介石取代北洋军阀统治之后，冠县有了国民党县党部，国民党县长候光陆逐步把持了政、教、财、文大权，无所不为。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又分成四派势力，东北派掌握党权，东南派掌握教育权，西南派掌握财权，西北派为地方势力派，他们明争暗斗，危害人民。对此，冠县人民深恶痛绝。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了绝对“不抵抗”政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宁赠友邦，不为家奴”的反动方针，将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本，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各大中城市迅速掀起抗日救亡怒潮。在这种形势下，在冠县第一高小上学的赵健民联合冯干才、王维羣、沙延孝、朱冠富、许梦侠、王志浩，于少畲等走上街头，开展抵制日货、“誓雪国

耻”的爱国宣传。他们还时常聚集在民众教育馆，看书看报，探求真理。为了寻找党组织和探求革命的道路，赵健民于1931年秋考入临清六县联立师范，在该校听到济南有共产党，又于1932年夏考入济南省立一乡师。他在该校秋季举办的演讲竞赛会上，发表了《乡村教育与中华民族的解放》的演说，分析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图霸中国的形势，提出唤起民众的主张。这一演说受到党组织的重视，后经姚仲明介绍入团，走上了革命道路。这就是冠县党产生的星火。虽然，在此之前冠县也有在外地入党的党员，如张永珍、任长山、王怀春、钱少武、姚汝安，甚至有二十年代入党的张浩然、杜××等，但他们在外地入党，又在外地从事工作，对本县没有直接影响。冠县真正出现党的活动，并逐渐发展壮大，建立各级组织，是“九·一八”以后的事情。

革命思想的传播与冠县

知识青年的觉悟

“九·一八事变”后，冠县一高的学生冯干才、王维羣、沙延孝、朱冠富等，不仅在学校，而且常集中到城内沙延孝家 and 三里庄朱冠富家，阅读一些进步书籍，如《少年漂泊者》、《纪念碑》、《彷徨》、《呐喊》等，社会知识和思想觉悟日渐提高。1933年春，一高因派系争夺，原校长张衍孔（国民党员）下台，换上李子西（国民党分子）。李子西平日压制学生，不准看进步书报，不准谈抗日救国，还对学生进行体罚，并灌输所谓“三民主义”，宣传“反共”主张。同年秋，本校毕业考入寿张八乡师的冯干才，不断回校传播革命思想，并发动了为期两个月的罢课斗争，举行游行，还到李子西家中“哭丧”。李子西伙同训育主任王梦更制造了学生在

校园暗放炸弹和书写暗杀匿名信的假相，并先后分两批开除了王志浩、许梦侠、郭思高、冯义仁、于树菴、于树森、钱文奎、梁秀杰、石连法、卞其昌、徐成林等十七名同学。这次罢课震动了反动统治者，也锻炼了学生。学生被开除后并未停止革命活动，继续阅读进步书刊，活动在县城内外，并在一高教师王桐春（冠县东关人，后被日寇杀害）、陈雨晴（长春人）领导下，走上街头，示威游行，纪念“九·一八”事变两周年。同时，师范讲习所与一高密切配合，又在林春阁、张鉴古、李风桐等进步学生带动下，进行了罢课、罢考和反对国民党CC分子教师金肖鲁的斗争等等。

这时，在济南一乡师上学的赵健民常回冠县，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道理，同青年们碰头、开会、研究回答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于1934年2月初分别发展冯干才（寿张八

乡师学生)、钱洪勋(县师范讲习所学生)、孙锡恩(济南惠商职业学校学生)入党。接着孙洪(孙锡恩)发展梁秀杰入党。冯干才是一名积极分子,他在入乡师发展同乡同学时玉泉、沙延孝、王维羣、郭增平等入党,在冠县又发展了于树菴、于树森、于东鲁、郭芳臣、许梦侠、许梦灵、朱冠富等人入党,这是一条线。孙洪又发展在临清十一中读书的王志浩,王志浩又发展卞其昌等人入党,这是一条线。冠县还有在聊城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入党的何金三等入。

这些党员,积极开展动员民众和团结教育青年的工作。何金三回到冠县师范讲习所任教,他和钱洪勋组织读书会,参加的有丹彤、何永振、林风臣、常子俊等;参加临清十一中读书会的有王志浩、李振周、卞其昌、齐涛等;参加寿张入乡师读书会的有沙延孝、王维羣、时玉泉等。同时许梦侠、张鉴古、于树森

也分别组织读书会的活动。这一时期，他们通过上海、济南和大名、保定等地订购了一些进步书刊，如《大众生活》、《读书生活》、《生活星期刊》、《永生》、《通俗文化》、《新认识》、《世界知识》、《光明》、《中流》、《海燕》等，还有鲁迅、蒋光慈、高尔基、托尔斯泰、果戈里的作品和康德、达尔文、严复的名著，少数人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一些马列著作。这对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激发革命精神，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冠县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奠定了基础。1935年前，虽有一些党员，但还没有全县性的统一的党组织。

冠县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1933年至1936年，山东党失去了同上级的联系。其间，赵健民一面为了恢复山东党同上

级的关系而到处找党，一面坚持独立工作，联系、恢复各支部和党员的关系，开展活动。1935年2月初，赵健民在冠县带领钱洪勋，以拜年的名义到堂邑县徐运北家，组建了鲁西特委。这个特委1939年6月与刘晏春领导的濮、范、观等县合并为鲁西北特委，刘晏春任书记，徐运北任组织部长，刘仲莹任宣传部长。

1939年夏，鲁西北特委书记刘晏春由冯干才陪同，来到冠县王维羣教书的张家庄小学接上头，后住到王村于树森家。第二天下午，在王村西头一棵大树下召开会议。刘晏春指定由王维羣、于树菘、于树森三人组成中共冠县支部。这是冠县第一个全县性的党支部，王维羣任书记，于树菘任组织委员，于树森任宣传委员。这次，刘晏春向他们讲了党的方针、政策和红军长征胜利的消息，介绍了直南党组织领导群众“抢粮吃大户”的经验。刘晏春斗争经验很

丰富，经他一讲，大家更加感到有了信心和办法。过后，赵健民从冠县回到济南时，还特地到这个支部开了一次会，介绍了很多情况，鼓励大家积极工作。

1936年秋初，刘晏春和刘仲莹以入乡师同学的名义，到张家庄小学王维羣处。他们商定后，在许辛村小学召开了会议。到会的有冯干才、王维羣、任玉民。刘晏春和刘仲莹向大家传达了省委指示，决定成立冠县工作委员会。王维羣任书记，任玉民任组织委员，冯子华任宣传委员，下设若干支部，暂不设区委。冯子华没有到会，后王维羣向他传达了省委指示和会议决议。

工委建立后，陆续成立了若干党支部。在师范讲习所以许梦侠为首建立了支部。钱洪勋负责城南街的工作，确定由沙晓鲁等人成立了支部。城东三里庄是许梦侠教书的地方，在这

里他和农民及知识分子广交朋友，发展了朱冠有、许兰堂、朱月桐等一批党员，由工委决定在这里成立了一个支部，朱月桐任支部书记。另外，城北关朱冠富教书的地方，由朱冠富负责成立了支部。王维羣、郭芳臣、王登铭等人成立了一个支部，王维羣兼任支部书记。这时全县共有六、七个支部。

对于如何开展工作，工委也进行了认真地研究。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确定：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反对南京政府不抗日、打内战以及何应钦亲日投降派的阴谋；在小学教员中提倡关心时事，学习进步理论和进步思想；组织读书会、同乡会、互相会，从中发现积极分子吸收入党；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适当分开，选择在群众中有影响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在公共场合多活动。以后刘仲莹

还介绍了大城市如何搞学生运动、组织群众游行、罢课、贴标语等方面的经验，以及组织农民群众的经验。

1936年秋末冬初，刘晏春、刘仲莹又从济南到冠县，先到了许辛村小学，后在兰沃乡农学校开会，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首先，确定把工委改为县委，并下设区委。王维羣任县委书记，任玉民任组织委员，因冯子华在莘县一带活动，工委改为县委后冯子华只任委员，宣传委员由郭芳臣代理。会后，相继建立了几个区委：城东北以许辛村为中心成立了一个区委，许乃昌任书记，钱文奎、卞其昌任委员，以后又增加了李一香；城里和三里庄成立了一个区委，朱月桐任书记，许梦侠、朱冠富、梁秀杰参加。城附近有个梁秀杰领导的支部归这个区委领导。城东南由钱洪勋负责，包括城内南街支部，成立了一个区委。支部少的地方，

暂不成立区委。

这次刘晏春、刘仲莹到冠县，根据省委指示，着重强调了知识分子、小学教员要与工农相结合，党的工作要深入工农，向工农开门，大量发展工农党员的问题。要求抓紧开展“白板”地区和村庄的工作，建立新的工作关系，在贫苦群众中发展党员。这一精神的贯彻执行，使冠县党的工作更加活跃了。经过努力，在“白板”村建立了一批新的工作点，如张货营的魏兰亭，石家寨的王西原，邢柳邵的张惠民，许辛村的司洛路，邓官屯的孙树萱，谈二寨的许树灵等。同时，在农民中发展了一些党员，如许辛村的郭兰溪、齐××，王辛村的王月亭、王富寿，司庞庄的刘奎信等，大大充实了冠县党的队伍。

1937年春，刘晏春、刘仲莹在许辛村小学召开会议，传达了省委指示，将冠县县委改为

冠县中心县委。王维羣任书记，任玉民任组织委员，冯子华任委员，郭芳臣任宣传委员。冠县从工委到县委到中心县委，表明冠县党组织开始进入一个有领导、有组织的发展建设和开展群众工作的新阶段。中心县委以下成立几个特区，由中心县委领导、莘县成立一个特区，冯子华任书记。南馆陶成立一个特区，因一时没有负责人，未能很快成立，后改为南馆陶工委，由南馆陶乡农学校教务主任沙延孝任工委书记。堂邑成立一个特区，由于少畚任书记，不久也改为堂邑县工委。

在这次会议上，刘晏春传达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陕北红军东征胜利的消息，领导大家学习了胡服（刘少奇）的文章，他们带来了河北省党的刊物《火线》，大家看后颇受教育，连夜复写，发党内传阅。另外，会议对有关工作，也作了研究和部署。强调要深入工

农羣众，建立基层组织，发动羣众，组织武装准备进行游击战争。要求党员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适当分开并结合好，注意隐蔽力量，严防敌人过早地发现。提出组织一批骨干，准备去延安学习，以便回来后更好地领导羣众的游击战争。到6、7月份，上级决定王维羣、钱洪勋去延安学习，郭芳臣代理冠县中心县委书记。此时，抗日战争爆发了。“七·七事变”前，冠县共有党员四、五十人。

此文在撰写过程中，曾参考过赵健民、王维群、许梦侠、丹彤、钱洪勋、于龙、徐运北、孙洪、钱文奎等同志的回忆文章以及其它有关资料。

对冠县八年抗战的回忆

马景汉

一、聊城失守前冠县的抗日工作（1938年春天至冬天）

我是一个“三八式”的干部。1938年元月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日寇侵占了华北。当时国民党的军队节节败退，鲁西北特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号召党员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爱国和进步人士范筑先将军，创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冠县由于地处冀鲁豫三省的交界处，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再加上战前党的基础较好，因此在鲁西北十几个县当中，抗

日工作开展得也较好。

早在1937年10月份，在外地的共产党员赵健民、郭英、郭林业、王志浩、孙洪、沙延孝等人先后回到冠县，与地方上的党员何金三、冯干才、许梦侠、朱月桐等人，建立了中共冠县临时工委，高举起抗日的旗帜，组织了近百人枪的抗日武装，镇压了冠县的几个维持会头子，并派得力的党员打入“南杆”、“北杆”这些土匪部队中做争取和改造工作。1938年春节前后，范筑先将军将“南杆”、“北杆”收编为六、五支队，调离了冠县，并将由我党完全控制的十支队调驻冠县；组建了冠县抗日县政府，十支队司令员张维翰兼县长（不久，张推荐冉光远任县长），共产党员王化云任县府秘书，具体负责政府工作。县政府下设了三个科，分别抓财务、教育等工作，王化云并想办法解决了部队和政府的给养问题。

1938年3月份，聊城保安司令部政训处派高元贵同志带领十几名政训人员来到冠县，建立了冠县政训处，并和地方党负责人郭英接上关系，建立了冠县临时县委。5、6月份，鲁西北特委派许梦侠同志回冠县担任县委书记，正式建立了冠县县委，领导冠县的抗日工作。在这期间，重要的事情：一是县委根据中央指示，打破关门主义，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大胆地在工人、雇农、城市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中，大量发展党员。在不长时间内，党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二是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政训处主持下，办了两期政训班，培养农运干部。农民互助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的群众组织相继成立。这些组织很快就发展到全县各个乡村，广大农民以户为单位都加入了农民互助会，在农会发展到高潮时，甚至一些富农

和中小地主也都要求加入。县区农民互助会都成立了脱产武装——特务队，打击敲诈勒索群众的兵痞残匪和土豪劣绅，保护农民的利益，改组村乡政权。

在我党收编土匪、恢复冠县的秩序之后，国民党的顽固反共分子王子强，回到城里重新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他们纠集极少数人，成立各种所谓的“后援会”，与我党领导的群众组织相对峙。他们篡夺了“小学教员联合会”的领导权，破坏我党领导的抗日活动。我党发动广大群众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国民党县党部及其组织的各种“后援会”最后全被摧垮。

1938年秋天，党为了发展群众抗日救国，我们冠县成立了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主要领导同志是高元贵。动委会就是后来抗联的前身，在县以下每一个行政区都设有一个分会。当时，我是第七区动委会主任，党

给的是两大主要任务：一是发展党组织；二是公开宣传动员群众起来，参加抗日救国，宣传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抗日。这时动委会的工作活动范围主要是深入广大农村刷写抗日标语，教唱抗日歌曲。那时候我们广大农村唱抗日歌曲很普遍，同时，动员广大男女知识青年参加抗日救亡工作。这时敌人还没有占领县城，全县动委会的工作进展很顺利，在整个鲁西北的抗日救亡工作中，我们县是活动的中心。聊城失守时间是1938年11月15日。当时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提出要与聊城共存亡。与敌人战斗，以身殉国。他组织的三十多个支队很快分化了，因为这三十多个支队成分非常复杂。鲁西北各县的抗日形势来了个突变。土匪武装在范死后，到处流窜杀人，抢东西，张炳元同志就是他们杀死的。自此，我们就开始了与敌、伪、顽斗争的复杂局面。

二、蓬勃发展的冠县抗日斗争大好形势。

（1939年春至1946年上半年）

1939年春夏之交，我被调到冠县任宣传部长。这时县委会还处于半公开状态，县委同志除开县委会集中外，其他时间都分散到各区农村。当时县委的宣传印刷机关就常住在小北头、常芦村等地。回忆当时党的中心工作主要有两大项：一是政权建设，夺取政权。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县区人民政府，从1938年到1939年秋，县、区政权，特别是区政权，除八区清水外，都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二是抓武装建设，组建地方人民抗日武装。这时县的军队叫营，冠县已建立了独立营，县里的武装力量最多时会达到三个营。区武装叫常备队，百人左右，少的八、九十人。区常备队的枪支来源就是动员收缴地主富农的枪支，1939年上半年还是这个情况。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国民党

统治时期每个区都有一个民团，纯属地富武装，县里叫总团。我县广大农村里的地主阶级掌握了很多武器。所以1938、1939年军队建设枪支来源主要靠这些。当时区常备队建成以后，曾多次一起升级到县独立营；县独立营壮大了，就升级到军分区独立团。1942年前，地方武装就是这样采取逐步升级的办法成长起来的，区常备队升级到县独立营后，再重新征员，缴获枪枝。现在已记不清升级有多少次了。

1939年秋，我离开了冠县县委宣传部，到七区任区委书记兼区长。这时全县共八个区：一区城关；二区城西南斜店、刘村一带；三区城南；四区桑阿镇；五区张庄；六区辛村一带；七区城北赵固一带，西到芦村，南到张平，北到李当铺；八区清水。这时开始实行一元化领导，由县委统一领导党、政、军、羣的工作。党政军羣工作按系统分工也逐渐明确。县区政府

组织的机构的设置，根据抗日斗争的客观需要，设有民政、司法、公安、教育、财粮等部门。县设科，区设区长助理。稍往后，约半年时间，区下又设乡，在全县夺取政权之后，还有一段继续对区、乡、村政权的调整、整顿、巩固过程，因为不论县政权或是区政权，在我们夺权之后，人员还是不纯的。比如，我在七区，在夺权之后，就是区长换了，助理还没换；我当区长后，原来的区长还留任了一段。他们都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对我们的政权进行了破坏。我记得，七区有个黄玉坤，家是黄王段的地主家庭子弟，还有一个助理，叫范勋臣，张平人，他本身就是地主。在我们夺取政权以后，调整、整顿是多了一点，现在看来是非常必要的。乡村政权，也在这时进行了调整，把有些村干部如各村的村长，都换成了我们的党员。

从1939年到1940年麦收以前，冠县的抗日

斗争形势是很好的。敌人于1939年夏前占领冠县县城，由于汉奸队还未形成，所以敌人的力量很小。我们的县政权和武装活动范围是很大的：东到桑阿镇，西到班庄，北到张庄、里当铺，往南更远。当时有一句话，说我们的政府是“围城转”。从1938年秋天开始到1940年这段时间，抗日工作的开展是比较顺利的，除军队建设外，地方各级政权，各项工作，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地方行政工作如民政、司法工作在人民群众中有了影响。由于“七·七事变”前冠县是由国民党政府统治着，按照我国人民群众中，源远流长的正统观念，国民党政府是正统的。要改变广大群众这个旧的传统观念，得有一个教育过程。所以，我们县区政权建立后，除发动群众抗日外，就是宣传抗日县政府的民政、公安、司法的作用。在人民群众中有了民事纠纷，有了大一点的案子，开始找抗日民主政府。政府往哪里一住，群众就找政府

的民政科、公安司法科，要求救济、打官司。小学教育普遍建立。在财粮上，也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发挥政权的作用，进行征收粮食税务，筹措抗日经费。1939年我当区长，秋天至春节，县区政权财粮状况是很好的，可以储存很多粮食，收的款也不少。总起来说，政权建设，政府的各项工作，1939年到1940年初建立雏型，打下了基础。同时，也开展了对敌斗争。1940年汉奸队未形成以前，城里的敌人还不出来。我们的斗争主要是搞锄奸、最突出的是反对招华工的斗争，当时招收华工都是少数汉奸在日本鬼子的指挥下干的。我们的政府凡是抓住了替日本招华工的汉奸就把他除掉。所以，1939年的对敌斗争主要是和汉奸的斗争。

1940年初，地委决定叫我担任冠县抗日政府的县长。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能够做到牺牲个人利益服从组织决定，接受了冠县县长这一

职务。1940年麦收的时候，根据地委指示，在我们鲁西北各县或者在冀鲁豫地区，我县民主选举抗日政府县长是第一次。当时为了避免敌人破坏，选举大会是在帽子岩召开的。当时全县各区都派了代表，结果我被选为冠县抗日县长。

三、与敌、伪、顽斗争的艰苦岁月（1940年下半年至1943年上半年）

1940年农历4月，我当了县长之后，冠县抗日斗争的形势从此开始恶化。这时早已占据县城的日寇积极扩大伪军（皇协军）。地方顽固势力以八区清水镇为中心，也积极扩大地盘，发展他们的顽固势力，这些顽固势力对冠北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影响是不小的。这是形势恶化的一个方面。同时，敌人对我这个年轻的县长施加压力，进行种种威胁。1940年5、6月份，敌人抄了我的家，把房子和大门都给拆走了，其次是杀死七区区长马廷骧。在我调离七

区后，接任区长的是马廷骧，他也是马王段人，是我远门族家的一个兄弟。敌人在杀死马廷骧后，把他的头在冠县城门悬挂了七天。第三件事是县政府警卫连连长邢鹤岭叛变投敌。1940年10月底至11月初，当时县政府住邢柳邵。由于敌人的阴谋策划，邢鹤岭企图杀死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带领警卫连叛变投敌。这次叛变由于我们发觉早，未造成恶果，在吕田村当即把他抓住枪毙了。

1940年冬，上级党委为了提高我的政治觉悟和领导水平，确定调我到山东分局党校学习，时间一年。在我学习期间，由苏羣同志代理冠县县长。1941年8、9月间，我回冠县后继任县长。这时形势进一步恶化，敌人积极扩大敌占区。残酷的斗争开始了，敌人的办法，第一是修公路，就是冠堂、冠馆、冠莘几条公路。冠莘公路一直没有修通，因为这是我们活动的

中心地区。再就是架电话线，筑碉堡，当时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叫安“钉子”。第三是挖封锁沟，敌人企图用深沟高垒来分割我们的根据地。我们与敌人激烈斗争的局面开始了。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发动全县群众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譬如，敌人修公路、架电话，我们县委就决定：公路不能叫它通车，电线不能叫它通话。白天，敌人强迫群众替他修公路，晚上还是这些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扛着铁锹把修好的路再毁掉。白天敌人的电话线架通了，晚上电杆、电线统统被我们拔掉。这样的斗争一直进行了两年，斗争是很激烈的，晚上有时我们就和敌人打起来。县大队、区常备队为了掩护群众破公路、割电线，就组织小股武装掩护群众，敌人来了就打。冠县在八年抗战中，敌人始终未修通冠堂公路。冠馆公路是在冠北变成敌占区后才修通的。对敌人修筑碉

堡，也是这样斗争。敌人强迫群众筑碉堡的时候，我们就发动教育群众“磨洋工”，修起后就给他扒掉。在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中，我们还进行了群众性的轰轰烈烈地挖掘抗日交通沟的运动。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当时是没有斗争经验的。特别是在秋收之后，青纱帐没有了（在当时抗日歌曲中，有一句“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敌人常在这时候进行清剿扫荡，我们地方武装吃了不少的败仗。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上级党委指示，我们就发动群众挖交通沟，对平原地形进行改造。这项斗争艰巨极了。到1942年下半年，凡是有我们的部队活动的地方，特别在冠县的南半部，村与村之间都挖了交通沟。这个办法，把敌人治住了。因为日本鬼子，包括伪军在内，在根据地内和老的游击区，没有我们地形熟，这就为开展平原游击战创造了极为有力的条件。事实证明，挖

交通沟，改造平原地形，是我们在平游地区打击敌人，保护自己，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从1940年4、5月份开始一直到1943年秋天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干的，工程大极了。

当时，冠县的鬼子最多仅住过二十多人，还不到一个中队。他们为了建设伪政权和扩大伪军的力量，常到根据地征粮要柴草，麦熟抢麦，秋熟抢秋。因此，我们就进行护麦护秋运动。县委领导有力地组织了民兵联防，及时侦察好，哪里麦子先熟，就到哪里去护麦。县委机关和县大队都下去帮助群众抢收麦子，并发动群众对敌人开展抗粮不交运动，进行坚壁清野。在开展藏粮运动时，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办。起初采取往黍子里掺麦糠、掺土的办法，使敌人不便弄走，后来采取挖坑埋粮的办法。由于农民的积极创造，积累了很好的藏粮经验。我记得1945年日本投降前，还吃过三年前

埋的粮食。

至于地下斗争，开展伪军工作，搞攻心战，与日本鬼子争夺伪军，在地委、分区的领导下，我们县这方面的工作也是很出色的。我们的敌工干部郭策同志很长时间就住在县城南街。冠县的伪军力量始终没发展起来，即使当了伪军，也不敢死心塌地与我为敌。当时分区敌工科印的“抗日同情证”，象烟盒大小，正面是关公像，后面是人心形状，半黑半白，里面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交给伪军做证件。

从1941年开始，斗争一天残酷一天，天灾人祸也开始了。1942年这一年，遇上了多年不遇的旱灾。从玉米冒红线的时候，滴雨不下了。谷子由于耐旱长得还不错，可是到了夏秋之间，又遇上了空前的蝗灾，蝗虫多得厉害，六、七亩谷子一个小时就被蝗虫吃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党指示我们领导群众展开了扑

蝗运动，白天用各种方法扑杀蝗虫，晚上点上灯笼火把扑。因此，共产党、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这年由于天旱霜冻来得特别早。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大秋作物没收什么，麦子没种上。1942年的天灾，造成了1943年严重饥荒。抗战八年最艰苦的岁月开始了。要开展对敌斗争，就需要扩大部队，但是没有粮食，别说再扩大部队，就是现有部队的吃饭问题也难以解决。因而，上级党委发出了精兵简政的指示。县里的抗日武装仅仅保留骨干力量，这时部队里一些好的干部和战士不得不精简下去。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战略措施。结果县区部队的数量大大减少，甚至分区独立团也大大缩减了。而敌人对我们则是步步紧逼，扩大民团，抢劫粮食。这时，顽匪齐子修占据了桑阿镇周围，特别是以东的地区；八区伪顽势力范围扩大了，象原来七区的里当铺、张固，六区

的柳邵甚至张庄都先后被八区伪顽势力控制了。从南陶到宣邑一线的廿里铺至孙疃、常芦村一带，敌人挖通了封锁沟，沿沟又修筑了碉堡，使整个城北，从表面上看去都变成了敌占区。敌人深沟高垒的分割政策搞成了，我们的根据地活动范围缩小了，形成了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最艰苦的局面。最大的威胁是军民没有饭吃，环境再恶化，只要有饭吃就好办。部队缩编了，机关精简了，还是没有饭吃。先是桑阿镇周围的农村，如吕庄、申小屯一带，开始吃树叶。到1943年春天就饿死人了。后来在村里，屋内炕上死了人没人埋，变成了无人区。越是在这种形势下，敌人越残酷。敌人为了抢粮，对我广大农村实行极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当时我县有许多村庄被烧，象胡疃就被烧过。这时，我们革命阵营里面的不坚定分子，经不起残酷斗争和困难的考

验，开始动摇，甚至投敌当了汉奸；也有的带枪逃跑，有的组织武装叛变。在这一阶段内，县政府警卫连发生了第二次叛变投敌事件。警卫连长赵云山组织叛变未遂投敌了，跑到王庄据点当了汉奸。这是一次难忘的惊险事件。1942年7月中旬，我们在反蚕食斗争中拔掉了王庄据点，活捉了赵云山，经行署批准，在西周堡把他枪毙了。

1942年6月10号，快麦收了，当时有冠县、馆陶、邱县、临清、堂邑、莘县的敌人以我冠南地带为中心，进行铁壁合围。我在邵庄遇险，由于当时的伪军李保奎和被我们简政回家的县大队司号员郭金同志掩护而脱险。

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我们对敌占区也开展了斗争，在敌占区组织两面政权。敌人把冠堂封锁沟搞成以后，从表面上看，冠北变成了敌占区。坚持敌占区工作的是区长梁文焕同

志。他是由党的培养变成了一个坚持对敌斗争，特别是开辟敌占区的功臣。为了开辟敌占区的工作，经过上级党委、政府的批准，我们尽量给梁文焕创造条件，给了他杀人的权力。他的警卫员的背包里就有县政府的空白布告。敌占区的伪乡长、伪村长如果为非作歹，死心塌地为敌效劳，他就有权把他们处死，然后贴上政府的布告。当然，也不能杀得太多；坏乡长、坏村长大概枪毙了两、三个，这就有力地扩大了我抗日政府的政治影响，打击了伪顽的势力和嚣张气焰。在敌占区，我们对敌人的斗争，一是做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和争取他们；一是给以有力的打击，即软硬兼施。在根据地里也是这样。我记得1942年，杀的坏人最多，缺一个不到一百人。对那些汉奸、特务我们进行了坚决地镇压。

敌人对我们越来越凶狠毒辣。1942年

秋天，我们县大队（县独立营）营长孙立民同志在白塔集遭冠县敌人突然袭击被俘。敌人对他用尽种种酷刑，孙立民同志始终坚贞不屈，于10月某日在临清壮烈牺牲。

在那战争的年月里，敌人对我们搞突袭是一贯的，都是在大风天、阴雨之夜、节假日进行。根据这个规律，我们为了避免敌人对我们县委、县政府和大队领导机关的突袭，在1942年、1943年和1944年上半年，都是一天转移一个地方。根据敌人的活动情况，决定我们行动方向。天一黑我们就离开原住的地方，后半夜进入选定的村庄，天天如此，都是夜里行军。由于整整一个冬天，大家都不敢脱衣服睡觉，有时敌情紧连鞋子也不敢脱。因此，我们每个同志的身上都长了很多虱子，生了疥疮。我记得1942年冬天，很多同志没有穿上棉衣。临清、馆陶、大名、冠县、莘县等地的日伪军又对冠

南、朝城北部进行了第二次铁壁合围。

四、形势的好转与抗战的胜利（1943年下半年至1945年8月）

1943年春夏以后，艰苦的抗日斗争形势开始好转。这时我们一方面对敌人搞军事斗争，一方面领导广大军民搞大生产。到1943年下半年，日寇已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苏联红军对德军取得了伟大胜利，使美、英军队可以抽调一部分兵力到太平洋方面来，发动对日本的越岛进攻。日寇由于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在敌后偏僻城镇仅剩伪军维持败局。这时冠县也是只剩下伪军，边远不重要的敌伪据点，敌人开始自动放弃，敌人已完全处于守势。我们的根据地扩大了，伪军更加动摇了。我们也加紧做伪军的工作，促使他们投降。1944年下半年，军政人员的吃穿问题解决了，冬天都能穿上了棉衣，军队很快扩大了。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对抗

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更加坚定了。从1944年下半年，我们党政军机关开始建立巩固的后方。军分区开始在后方建工厂，生产军用被服鞋帽，这年冬天分区战士戴上了羊毛毡黄色军帽。我们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1943年下半年到1944年上半年，我们领导广大军民搞生产，搞得热火朝天。桑阿镇无人区荒草长得一人多高，分区部队、县里机关就去那里开荒种地。政府向农民贷款、贷粮、贷农具，缺什么贷什么，领导农民把生产搞起来。这年秋天，县里召开了劳模大会，评选了劳动模范，赵庄的杨培义同志就是领导群众搞大生产的县劳模。尽管如此，敌人仍进行垂死挣扎。1945年春季，有天拂晓，从莘县来了一股敌人，路经吕庄，对我无辜农民和抗日军政干部家属进行了大屠杀。如当时我抗日县政府公安局长杨恒一同志的父亲就是被敌人用刺刀活活挑死

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我们的广大抗日军民沉浸在狂欢之中，到处都可以听到、看到由军民联合组成的秧歌队、腰鼓队、跑旱船的、踩高跷的，扭呀，唱呀，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不久，冀鲁豫行署组织干部北上，出关支援东北，有些干部服从党的决定到东北去了。我们专区是周持恒专员带队。这时敌人也放弃了冠县。我们的县政府在春节后从崔八里庄搬进了城里。县委、县政府领导群众发展生产，平封锁沟、拆碉堡，扒城墙，组织担架队、运粮队、支援我军解放敌人还未放弃的城市。如馆陶的县城就是我军打开的。赵健民同志指挥了这次战斗。孙洪同志也参加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在冠县又工作了一年。我们的党和政府领导群众发展生产，开办学校，植树造林。1945年秋天，县委书记王志浩

同志已调走。孙洪同志接任县委书记，没多久时间，去送三十五团到二野二纵，就留在那里了。1946年县委书记是杨立功，组织部长田坡，宣传部长司洛路，抗联主任刘剑，妇联主任刘序，公安局长杨恒一。1946年秋天，全国形势起了大变化，各个大战场都打了大胜仗，战场南移，开辟新解放区。这时组织调我和孙洪同志去中央在山西省阳义镇开办的中央党校分校学习。从1946年秋天至1947年秋天，在党校学习不到一年就结束了。离开党校后，晋冀鲁豫边区举行了治陶整党。冠县参加的人有县长梁文煥，县委书记杨立功。治陶整党结束后，我县参加了三地委进行的柳林整党，由地委书记韩宁夫主持。这时我任堂邑县委书记，从此离开了浴血战斗和工作了八年多的故乡——冠县。

（党史办公室供稿）

壮烈殉国，浩气长存

卫河支队六十二烈士英雄事迹纪实

刘文科

冠县南陶乡后田庄村后，绿树环抱，碧草成茵。在这幽静的古黄河故道上，耸立着一座雄伟的墓碑，巨大的坟墓中合葬着62位烈士的遗骨。每当清明来临，无数干部群众、少先队员怀着肃穆的心情，捧着艳丽的花圈来到这里，缅怀革命先烈，听老人们讲述那动人的英雄事迹。

1937年，芦沟桥事变。日寇长驱直入，国民党闻风而逃，把华北地区拱手让敌，大好河山蹂躏在日寇的铁蹄之下。我党号召人民拿起刀枪，保卫家乡，保卫全中国，与日寇血战到底。1938年在后田庄成立了党的中心支部。上

级派来了以李善保为团长的工作团，着手组织抗日游击队。爱国青年积极响应，当时就有11名青年参加，取名为“东临支队”。动员民众有粮出粮，有枪出枪。一时出现了妻送夫、父送子的参军热潮。很短时间，游击队发展到100余人，改名“长迹支队”。1939年底改为卫河支队，发展到500余人。后改编为先遣队一团三营十连。团长于笑虹，政委李长青，十连连长王德林，指导员由冯汇川担任。

1940年2月（农历腊月三十），部队奉命开往南宫一带，歼灭叛军石友三（即十军团）。经过13天激战，石部只剩少数散兵向河南流窜，当时上级命令穷追猛打，不使一个敌人漏网。十连在乘胜追击到邱县以南曲周以东时，与从邯郸而来的5000余敌军相遇。因敌众我寡，悬殊太大，我军遂撤到临西仓上一带，又遭敌人四面围攻。为避免重大牺牲，奉命化整为零，

分三路突围。当十连冲到赵官寨以南时，遭到驻馆陶敌人的截击。1940年农历正月十二的拂晓，战斗打响了。一时，我军伤十余人，三排长张学府和指导员均挂彩。连长王德林下令抢回赵官寨，与敌人展开巷战。敌人调集威县、临清、曲周、邱县、邯郸等处敌人进行合围，把我军压集在一座土楼内，经过一整天的战斗，全连牺牲很大，只剩30余人。最后敌人用柴火把土楼围住，点燃起来。此时我军弹尽粮绝，纷纷跳入楼下的熊熊烈火中壮烈捐躯。

六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传开后，《新华日报》发表了表彰英雄的文章，同时受到边区政委刘伯承同志的表扬。

1946年，党决定将全部烈士坟墓由赵官寨迁到支队的诞生地后田庄安葬，并竖立墓碑，永久纪念。冀南军区7分区政治部主任于笑虹同志撰写了碑文，叙述了这次战斗的始末。

附碑文如下：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爆发。日寇随国民党军队步步南进，津浦、平汉两路不数月即为日寇所占。日寇凶焰所向，国民党靡靡逃散。共产党喊出了拿枪来保家乡的口号，提醒了父老们，了解自己也有力量。从这时起，一个个热血青年辞别了父母，离开了家乡。他们要夺回抢走的船只，被占去的庄田。有枪的好户们情愿把枪交给他们。从一到十，从十到百，从这里到那里，卫河两岸活动着一支力量，这就是人民不能忘记的卫河支队。接受了家长的嘱咐，接受着四乡父老的养育，依靠着共产党，他们的抗战意志日益坚强，斗争经验日益丰富。游来击去，击去游来，他们足迹所至，卫河两岸的人民恢复了安定的生活。从此，他们成为人民姣子，也成了敌人的痛钉刺。失望了的人心又复活了，猖狂已极的敌人又遭到

棒喝，死在野兽的残暴淫威下的鲁西北又放出了光明。像一阵妖风袭来，二十九年刚擦过新年，河北、山东国民党军队勾结敌伪，发动了大举的反共高潮。石友三、张荫梧等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和日寇的残酷扫荡，盘旋连环而来，根据地的光亮顿时现出暗影，快乐的人心又为恐怖所笼。人民和他的子弟兵为了生存下去，他们不怕腹对日寇的扫荡，背受国民党叛军的暗伤，愤怒的火焰烧心，自卫的声浪响彻了平原，不可抗拒的力量，终于粉碎了内贼和外寇的联合阴谋，叛逆们失败了，胜利属于人民。可是，胜利总是血泪和骨肉交织着吧！根据地里，多少父母看不见儿子，多少儿童曾未见过爸爸。赵官寨的六十二位烈士也是在胜利中为敌人夺去。正当进击叛军于邱县以南地区，叛军竟勾结日寇步骑三千余，由邯郸出发，讨逆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与敌激战于候村，吕

洞涸，再战于东西张孟，歼敌四百余之后，暂趋零散，避敌锋锐。执意狂敌为声援国民叛军，竟肆意穷追我卫河支队。由侯村地区北返临西，辗转四天，始终未脱离强敌。阴历正月十二日，临、馆、邱、威四县敌人又同时出动，配合宿营于东目寨、香城固一线之敌主力数千，合击下堡寺地区。不幸我卫河支队适于夜间转入该地区，拂晓查明敌情乃南转之仓上，正遇临清出动敌人五百余。敌以炮火进击，我则继续向南挺进。王草厂的部队疲劳饥渴，不能前进，不得已停止，略事休息。一霎时，旭日变为阴暗，疲困转为紧张，后边进兵赶来，西边东目寨、邱县敌之主力由西北而东南插来，馆陶敌人也同时由东南赶来截击，我部竟处于三面强敌，一面卫水之包围中。千钧一发之刻，决心两路并进，向南突围。但已辗转十数日夜于雪泥中讨逆未得片刻休息之我军，

实难对七八倍与我之强敌。果然，行至赵官寨村后，西边敌人迫近，将我二营部队掐断，南边馆陶敌人迎头拦住我三营部队。当时，除少数同志由两股敌人之中间向西南突出外，大部都被包围于赵官寨村后野外中。当时，我二营部队仍向西北敌来方向，且走且化整为零，遭敌严搜一整天，事后又集结起来。我三营部队除九连随二营方向同出外，余在教导员孙树声与十连连长王德林同志率领下，抢入赵官寨村里，坚守一座民楼。在千余敌人炮火强攻下，我六十二位同志坚守一天半夜，始终不屈，直至最后一弹、最后一人。敌人纵火攻楼，王德林同志两处中弹殒命。在无法再守下去的时候，我亲爱的教导员孙树声同志举枪自我，随之我弹尽援绝的同志纷纷跃身火内自焚。冲天的火焰，燃烧着凌云壮志，千万条毒蛇叮身，千万个铁钉刺心，壮士们不为日寇所屈，也没

有被大火所屈，死在一块。还有人打日本。火焰对他们变成了亲爱的东西，因为有了最后一颗子弹，只有火焰也能保护他们，不被敌生俘。当敌人完全证实了他们俘获了一片火焰之后，昂然的鬼头低下了，凶残的面孔暗淡了。灼热的火焰对他发出透体寒光，吃人的野兽们，骄横的胜利者们，内心也被壮士彻底俘虏了。夜的火光，仍然吸引着周围数十里焦急的人们。已深夜，但仍不入寝，老老少少们，都在村口张望着，等待着，走来走去的，希望能突然出现一股奇兵，来救护他们。最亲爱的火焰唤着人们的心，焦急的火焰和愤怒的火比赵官寨的火还要高出万丈，年轻的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向火焰奔去，但终被年老的人们阻住了，手无寸铁不挡事。老太太们忙着找香找火，佛前跪拜，默祝保佑他们安全。她们想起张班长的和蔼笑容，又想起孙同志给排水，李

同志抱着孩子买油条吃，这伙人不能完，好人谁也灭不了，老佛爷也一定保佑好人。我已在十五里外的一个村庄，夜色北风和地下的雪陪着，站在村口上，枪声由缓而紧，由紧而稀；火苗由小而大，由低而高，又由高而低。没有说的，感受着火苗，感受着枪声，不能想象随着枪声子弹是打落到什么地方，是落到哪同志身上了呢？满林河呢？冯汇川呢？张思俊、赵新河呢？刘化文、张学浦、程秀德、张万顺、赵新禄等，这些活泼生气的青年人火焰象毒蛇舌尖一样地舔着哪一个了呢？没有了。部队又没有友军，如何把他们从火焰中拖出来呢？父老们以最大的信任把儿子交给自己，这样的结果将如何再见父老们呢？惭愧、焦急和愤怒，这么着隐站在村口上，感受着一切。阴森的夜晚呼号北风，房顶和树枝上的风雪凄泣着落地，刺骨的冷气象是要淹没火焰的灼热，但火焰仍

是由低而高，由高而宽。夜沉落于火焰，这才暗淡了些，直到东方的明亮夺取了火焰的光亮，一股白烟仍在向上盘绕着。赵官寨的壮举，促使着卫河支队飞快的进步，也促迫着更多的青年走向战场，促迫着我时刻不敢忘记学习烈士们的精神和完成烈士们的遗志。八年来，你们仍活在我们心中，谁也不会忘记你们是日寇和反动派的联合阴谋下而殉国的。日寇已经投降了。我们常清楚的计算你们的仇才报了一半。放心吧，安眠吧，亲爱的烈士们！

烈 士

刘振山	张廷珍	张思陵	马青山
张林堂	程万里	李振山	张保兴
冯汇川	乔 小	李振起	孙树声
程金池	翟风义	郭正禄	李玉良
刘文元	赵新安	李登玉	石好贤
李振保	陈玉彬	王德林	张万顺

张思俊 张玉法 张学付 王凤云

曲怀朱 冯连波 王泽民 么富栋

赵墨祥 张士成 王玉兰 程秀德

程金禄 满林河 么化义 赵新禄

赵新太 庞光明 温长善 么法远

冀 军区七分区政治部主任于笑虹过撰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小阳月上浣谷旦



六十二烈士墓碑

原碑文少 18 位烈士，仅此说明。

冠县回族人民在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中的贡献

民侨宗办公室

回族人民在历史上，有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为保卫祖国，立下了功绩。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冠县回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创立了令人可敬的英雄事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芦沟桥事变，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节节败退，华北沦陷，全国动荡。在这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动员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伟大号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冠县回族人民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都卷入了抗日救国运动，在极其艰苦的环境条件下，奔赴抗日前线，英

勇战斗，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做出积极的贡献。在鲁西北抗日根据地中，影响较大的回民主要有王国壁、何永振、张百川、沙俊耀、常乐南、杨仓等五十余人，都以忘我的革命精神，参加了抗日救国活动。还有在封建枷锁下的妇女也参加了抗日队伍，共同宣传抗日，组织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并涌现了一支由回民姑娘组成的红色娘子军。她们主要是张堃、沙春喜、王振凡、齐书兰、沙春莲、沙晓鲁、王翠银、王翠娥、王翠珠、沙春萍、郭勇、沙金声、沙玉振、蒋秀荣等为代表。她们都是没有出嫁的姑娘，挣脱了封建枷锁，冲出大门，奔赴战场。在鲁西北广大妇女中起到很大影响，带动了广大妇女参军参战，母送子、妻送郎，掀起了参军高潮。他们烧水做饭、洗衣服、做军鞋、象对待亲人一样，迎接慰劳八路军。军民团结亲如一家，鱼

水难离。把抗日战争变为人民的战争，鲁西北广大妇女真正起到了半边天的作用，她们对创立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贡献了一定的力量。

1942年到1943年，中国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犬牙交错的战争形势，是抗日最困难、最艰苦的时期。日本对抗日根据地，反复清剿、铁壁合围、蚕食斗争，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加上天灾，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冠县的回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极端困难面前，没有被压倒，坚持抗日。回民支队马本斋奉上级指示，开赴鲁西北，以大张鲁为活动中心，转战于冠县、莘县、朝城一带。为了抗战，冠县回民有二百二十五人参军，占回民人口的6.7%，其中绝大多数参加了回民支队，壮大了抗日力量。由于马本斋司令员卓越的指挥才能和战士的无比英勇、拼死搏斗，取得了多次胜利，保卫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冠县回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的，据不完全统计达三十五人。其中沙延孝就是为国捐躯的杰出人物，他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曾任筑先纵队三营教导员，为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献出了宝贵的一生。烈士们的鲜血染遍了鲁西北的大地，他们的功绩永垂不朽。

孙立民传略

党史办公室

孙立民，又名孙长山、孙长信，乳名小山，1914年6月6日生于山东省冠县唐寺村一个中农家庭。兄妹四人，父亲早逝，跟祖父长大。

孙立民九岁读书，十一岁考进冠县县立高级小学。他擅长绘画，尤以数学最好，深得老师的赞扬。1928年夏高小毕业。由于祖父年老，弟妹年幼，他便过早的分担了家庭生活的重担。

1933年夏，孙立民考入冠县师范讲习所，次年夏又到外地就读乡农学校。“七·七事变”后，乡农学校停办，他于1937年冬回到家乡。

孙立民自幼性情直爽，有正义感，爱打抱不平，关心国家大事。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亲眼目睹祖国大好河山被日寇蹂躏，激发了他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和爱国热情，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他一心想投笔从戎杀敌报国，但由于家庭生活所系，屡受老人的阻挠。每当和村里的年轻人啦起来，他常愤懑地说：“椋子树的果实熟了也离不开树枝，咱们的老人也象这树一样‘恋子’。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好男儿志在四方，我们不出去，谁去？”1939年，二十五岁的孙立民再也憋不住了。八月间，他终于冲破家庭阻拦，毅然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冠北游击大队。

开始，孙立民在连队当文书，搞文字工作。由于他虚心好学，作风正派，生活艰苦朴素，平易近人，深受干部战士的好评。12月，被提拔为一连一排副排长。1940年3月底，县

长王化云在班庄把冠北游击大队和原冠县游击二营，合编为“冠县游击营”，孙立民任一连连长。5月，经组织干事齐钦介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工作更加积极主动，任劳任怨。6、7月份，县委提任他为该营营长。

冠县游击营是当时冠县县委直接领导下的一支主要的武装力量。孙立民担任营长后，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在工作中处处以身作则。在每次战斗前，他总是周密计划，亲临阵地观察地形，确定好攻击点后，身先士卒带领战士投入战斗。

1940年11月初，冠县县政府警卫连连长邢鹤岭，企图带警卫连叛变投敌并阴谋杀害县委和县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在这危急时刻，孙立民闻讯带队火速赶到出事地点，生擒叛徒，使我党政领导人转危为安。

40年11月，冠县游击营编入军分区基干团，孙立民任该团第一营营长。

40年12月，军分区决定让齐钦回冠县，组建了新的游击营，不久改名为冠县独立营，李辉路任营长，齐钦任教导员。

1941年6月，地委决定让齐钦到冀鲁豫三分区受训，营长李辉路调莘县工作，孙立民回冠县再次出任独立营营长。9月底，齐钦受训回来，替换孙立民参加轮训。

在受训期间，杨得志司令员、苏振华政委以及崔田民、唐亮等军分区首长分别讲课，使孙立民的政策水平和军事素质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他曾多次向教导员齐钦表示：从今以后，一生忠于党，坚决抗战到底！

受训回来后，他非常注重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经常给战士上军事和政治课。在一个北风凛冽、严寒刺骨的上午，战士们集中在一个冰

雪覆盖的场院里听课。有些人冻得支持不住了，跺起脚来，秩序有些乱。孙立民并没有批评大家，而是把鞋一脱，裤腿一挽，赤脚踏在冰雪上纹丝不动，平心静气地继续讲。整整讲了两个小时，使战士们深受感动和教育。

1942年夏季，严重的旱灾和蝗灾，很多地方颗粒未收。部队虽然精简，但供给仍十分困难，有时竟连饭也吃不上，即便这样，还得行军打仗。在此情况下，孙立民更加关心战士的生活和群众的疾苦。他从不以营长自居，和战士亲如骨肉，情同手足。生活上，他和战士同吃同住；行军时，常用自己的马驮伤员或枪弹。有时他还替体弱的战士扛枪。他经常找战士促膝谈心，了解战士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对同志的缺点错误，总是耐心说服教育，从没发过脾气。每当住到一个地方，他起早睡晚，查岗查铺，对战士关怀倍致。在他的

带领下，独立营纪律严明，常为百姓排忧解难，和羣众结下了鱼水深情。

1942年，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地区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疯狂的“三光政策”。为了粉碎敌人破坏我抗日根据地的阴谋，适应对敌斗争的新形势，冠县县委、县政府于9月24日在城南大李村召开了全县武装部队检阅大会，军分区领导传达了上级指示，动员全体指战员以坚强不屈的精神，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

会议结束后，26日晚，孙立民带领独立营和一区队200余人，转移到白塔集村。由于敌人探知了这一行动，翌日早晨，日伪军集结三百多人，从南、西、北三面突袭白塔集。情况突然，孙立民一面让侦察员继续侦察，一面安排连队严密注意情况准备战斗。

这时，敌人已从南、西两面开始进村。孙

立民带着通讯员来到十字街时，刚要转身，敌人已围上来，他们只好边打边退。到北门外时，一阵机枪扫来，他的右腿膝盖被打碎了。通讯员给他简单包扎了一下，将他背到不远的坟地里。借着坟头的掩护进行还击，子弹打光了，在这种情况下，孙立民把自己的手枪和日记本交给通讯员，命令他快冲出去，转交齐教导员。当敌人靠近时，他忍着伤口的剧痛，扔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

孙立民被俘了。当敌人得知他就是营长时，立即将他带回县城。

孙立民被押到冠县日军司令部后，敌人诱降不成，当晚又把他转到临清侵华日军大队司令部。

在临清，敌人软硬兼施，企图迫使他投降。孙立民大义凛然，义正辞严，痛斥日寇，宁死不降，表现了共产党员坚强不屈的民族气

概。他被捕五天五夜滴水未进，绝食绝医，坚贞不屈，使敌人一无所获，最后被日寇残酷杀害。年仅二十七岁。

当孙立民被捕后，虽经党组织多方营救，但都没有成功。牺牲后，通过敌伪关系将他的尸体从临清运回冠县，安葬在他的家乡。

10月10日，军分区和冠县抗日政府，在城南根据地耿楼村召开了追悼大会。台前两侧分别写着“大义凛然”，“我党模范”，横披：“孙立民同志精神不死”。分区司令员赵健民和县长马景汉主持了追悼会并讲了话，表彰了孙立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号召全体军民向他学习。英雄碧血洒大地，人民热泪悼英灵。台下哭声一片，为失去这样一位好营长感到无比悲痛。

冠县人民出于对英雄的敬爱，将他的英雄事迹编成歌曲四处传唱。抗战胜利后，在他受伤被俘的白塔集成立了“立民完小”，以示纪念。

记第一任“柏江队”队长王登铭

党史办公室

王登铭，山东省冠县贾镇王辛村人，中农成份，1910年生。父亲王福增，字月川，人称“王老月”，是乡间有名的中医，曾在本村和冠县县城北关坐堂行医。其人聪敏直爽，敢说敢作。由于家业破败，生活困难，只念了二、三年小学就回家参加了农业劳动。有时跟着父亲在中药铺当帮手，接待、照顾四邻八乡来就医的病人。这使王登铭有机会较广泛地接触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士，了解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因此，他对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无比痛恨，对广大贫苦乡亲的处境十分同情。常同他们一起议论世道的不公，希望人民群众过上有地种、有饭吃、有衣穿的好生活。

1935年初，王登铭同村的共产党员王维羣因家境贫寒从寿张八乡师辍学回家，在张家庄小学教书并以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他经常和王登铭一块谈心，不断向其讲述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讲革命的道理。他认识到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闹革命，实现人人平等，才能过上美好生活。1936年秋，王登铭经王维羣介绍在王辛村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登铭入党后，在冠县县委书记王维羣亲自领导的辛村党支部参加工作。他在工作中积极主动，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经常在本村与附近村庄利用各种关系向农民讲述革命道理，宣传党的主张，很快成为党的一个活动分子。1936年冬，中共冠县县委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提出：“党的工作要深入工农羣众，大力发展工农党员”，“开辟新的工作点”后，王登铭首

先在本村活动，先后介绍王月亭、刘玉来、刘玉海、许贵荣、韩志江、王福立等八、九个贫苦农民入党，又在司庞庄村发展了刘奎信等人，由王登铭任支部书记，还陪同王维羣到谈二寨、田村、邢柳邵等村庄建立了新的工作关系。同年，王登铭听县委传达冀南抢粮吃大户的经验后，积极深入到附近村庄，向广大贫苦农民宣传冀南地区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抢粮吃大户，与豪绅地主进行斗争的经验，启发贫苦农民的革命觉悟。积极搜集枪支，准备武装斗争，同郭芳臣参加了五支队。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了开展抗日救国斗争，王登铭积极活动，通过各种关系，组织抗日武装。

1938年春，我党直接领导和组建的抗日游击第十支队在冠县正式建立。县委和县政府也相继重新组成，并建立了各种群众抗日团体。

王登铭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斗争。在1938年秋至1939年春，县委领导的清乡运动中，王登铭同辛村一带的共产党员一起，积极发动群众成立工农青妇抗日救亡团体。开展抗日救国斗争，并领导群众开展清匪反霸，夺取乡村政权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冠县原六区南部一带的封建势力，使六区南部的十几个村庄成了可靠的抗日根据地。王登铭成为领导群众开展抗战的坚强骨干，被县委提升为六分区委组织委员、书记。

1939年6月3日，日寇占领了冠县城后，抗日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共冠县县委和抗日政府也由县城转入了农村。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保卫县委领导同志的人身安全、打击和惩治日伪汉奸，县委于7月1日在斜店乡吕屯正式组建了县委武装工作队，王登铭被任命为队长。7月14日，鲁西北地委书记张炳元被国民

党顽固分子王金祥的营长马泽远杀害，为纪念张炳元（字柏江），县委武装工作队改名为“柏江队”。王登铭这时经地委批准提拔为县委委员、县委战争动员部部长兼“柏江队”队长，负责全县的武装动员工作。王登铭在新的革命重担面前，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不怕困难的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他领导“柏江队”以“围城转”的战术，同敌人进行了坚决地斗争。封锁资敌人员入城，惩治汉奸，保卫了县委机关的安全。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武装，王登铭于1939年8月13日（阴历6月28日）独自一人骑自行车去许谈二寨以串亲戚为名，进行抗日宣传，动员枪支，不意被在清乡运动中曾受到打击的富农反动分子许广荣枪杀于回村路上，时年29岁。

王登铭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作风泼辣，又善于联系群众，是我党的优秀武装干部。他

的突遭杀害，立刻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封顽势力的无比仇恨。1939年8月底，赵健民亲自率领筑先纵队第三营，在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一举摧毁了封顽武装六区队，活捉了杀人凶手许广荣（后潜逃外地，1955年在河北省唐山市被捕归案，56年枪决于冠县贾镇）。

“柏江队”也在为王登铭队长复仇的呼声中，由小到大，愈战愈强。为了纪念王登铭，中共冠县县委于1940年组建了“冠县登铭抗日游击队”，调王登铭的亲密战友张金铭和索易然任该队队长和指导员。1946年，冠县人民政府在六区大张庄设立了“登铭完小”。

王登铭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活在冠县人民的心中。

1986年11月12日经王维群亲自修改定稿。

回忆先父李一香

李 荫 川

(一)

我父亲，原名李芸台(1889——1970)，生于山东省冠县李辛村的一个贫寒的书香世家。

幼年时代，他受封建礼教薰陶，也被灌输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思想。青年时期教过学、做过小职员。结识了不少知识分子及当地上层人物。他经历了民国初年的军阀割据以及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时期，由于目睹了反动统治的腐败，尝尽了民族灾难的苦涩，对中国向何处去？一个热血青年应走什么道路？等问题久久在脑海中萦绕，他左右彷徨、上下求索。终于，在1935年6月24日找到了中华民

族的救星——中国共产党，并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在党的领导下，他积极参与救国救民的斗争。在群众中热情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使人民群众懂得只有依靠共产党，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救亡图存，走向幸福的社会，达到人人有地种、有饭吃、有衣穿、实现耕者有其田。

为了更好地开展党的统战工作，壮大党的力量，他秘密发展了李佃明、李荫堂等地下党员，并接受党组织的任务，以外出找职业为名，去天津、济南、东阿等地，通过各种关系，贴传单，发展党组织，为党的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日寇侵华

战争全面爆发。党中央发出通电，号召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国人民拿起武器，保卫家乡，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当时他已年近五十岁，但不畏艰险、不怕流血牺牲，发动组织人民，收缴地主武装的枪支弹药，创建了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游击队。1938年秋，上级党组织任命他为冠县抗日六区政府区长、兼冠县游击二营营长。活动在冠县六区、八区和冠堂边境一带。他们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在兄弟部队密切配合下，多次在李辛村、许辛村、张庄、张柳邵、大柳邵、邢柳邵、许谈二寨、王善一带打击敌人。给予当时石友三、齐子修、周致中、吴连杰、韩春合、栾小秃等土伪顽杂以致命打击，使那些一时气焰嚣张的亡命之徒，惶惶不可终日。最振奋人心的一次是李辛村战斗。那是1939年秋天，齐子修匪部三千余人，与顽八区的汤富楷、刘阻龙、李耀同等封

建地主武装勾结在一起，夜间偷袭我游击二营驻地李辛村。该村当时有百余条枪支的人民武装，配合六区抗日区政府、游击二营并肩作战，打得十分英勇。两天两夜，打退敌人数次进攻，死伤敌人近百名。一直坚持到第三天，赵健民率筑先纵队赶来增援，敌人才狼狈逃窜。战斗的胜利，打击了敌人，鼓舞了人民，得到了上级的表彰与奖励，抗日县政府奖励李辛村手榴弹四百枚，地雷八只。

1940年春，鬼子和伪军近三百人，拂晓由冠县出发，对我冠堂边境根据地进行“扫荡”。当敌人行至许辛村围寨西门外时，我父亲亲自指挥部队，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调头逃窜。他率领战士一口气追出五华里，把敌人赶回了冠县县城。当地人民群众箪食壶浆，为游击二营大庆战功。一次次胜利，一张张捷报，有力地鼓舞着人们的抗日斗志，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对巩固我县抗日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

(三)

1942年冬，父亲再次被任命为冠县六区抗日区政府的区长，后又任冠堂边、武训县（原堂邑县）参议室主任、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在开辟冠堂边境的斗争中，首次战斗是打张庄，消灭了汉奸伪区部和伪区队，活捉了伪区长胡邻瑞和伪区队长张东鼎。后又在该地区同日伪顽杂进行了多次地反复地武装斗争，仅大的拉锯式的战斗就有七、八次之多。这期间，我父亲任县参议室主任，他和县参议员穆仲山、赵阴亭、韩又宜等共同努力，为贯彻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做出了极大贡献。当时，冠县有名的六、八区，封顽势力强大，村村有围寨和地主的武装政权。我党我军为尽快开辟这一

地区，要求以统战为主，尽量减少流血斗争。他和几位参议员按照党的指示，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深入到这些地方，利用旧关系，拢络上层人物。如小郭寨村的吴雪桥、张庄村的王如梅等，对他们晓之以理、申明大义，分析形势，阐明利害，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对敌人内部，他靠在此地工作时间长，熟人多的有力条件，曾几次和伪六区区长胡邻瑞、杂牌军齐子修的冠县县政府的科长李耀同面谈，劝其正视现实，及早回头，均获较好的成效。1943年8月14日，我军分区基干团、冠堂边县级部队和县区机关团体，计划在六区王羨村召开全县生产救灾种麦会议。当天夜里，便收到贾镇日伪据点伪军老鹄六送来的情报：日伪军企图连夜合围王羨村。于是我军迅速转移，使敌人扑了空，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由于工作成绩卓著，父亲和几位县参议

员、劳动英雄杨淑英、回民代表李文科，代表冠堂边地区光荣地出席了冀南行署，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边区参议员会议，劳模生产会议。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赢得了荣誉。

父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他的业绩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刻载在历史的丰碑上，流芳千秋。

（党史办公室供稿）

“血水井”惨案

党史办公室

1943年，我国抗日战争已进入了第六年。疯狂的日本侵略者为了推行“强化治安”，蚕食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多次大扫荡，妄图用残酷的“三光政策”，镇压抗日群众，消灭我抗日武装。加上1942年春天开始的严重自然灾害和土匪顽杂的侵扰破坏，冠南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

当时，冠县南部以白塔集、赵庄为中心的周围二十几个村庄是中共冠县县委、县政府、县大队和其他抗日武装力量经常活动的地方，是冠南抗日根据地的坚强“堡垒村”。特别是白塔集，在冠县最早组织起“青抗先”小组，他们联合外村的青抗先队员，割电线，破坏敌人

交通，袭扰敌人的炮楼据点，取得了优异成绩，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县青救会在全县范围内推广了他们的斗争经验。对这一带村庄革命群众的抗日行动，日寇早就恨之入骨。

日寇为摧毁我党、政、军领导机关，消灭我抗日武装，6月10日，从周围的邱县、冠县、馆陶、临清、聊城、堂邑、寿张、阳谷、莘县、南乐、大名等十一个县调动了一万四千五百名日伪军，二十二辆汽车，两辆坦克，二百多匹战马，以白塔集、赵庄为主要合击点，兵分十五路，对我冠南抗日根据地开始了一次最大规模的“铁壁合围”。

10日黎明，敌人形成合击圈，群众发觉后，纷纷离家出逃。上午9时左右，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的日伪军将逃难的群众合围在前李赵庄村内。疯狂的日伪军进村以后，即开始了大搜捕，烧杀抢掠，整个村庄笼罩在一片恐怖

之中。10时左右，躲藏在该村西头李长山家两间北屋里的二十名群众被发觉。其中有一位从白塔集逃来的开中药铺的医生，叫廉吉章，年纪五十多岁，身穿紫花衣褂，精明干练，最先引起了敌人的注意。经搜查盘问，发现其手上没有老茧，身上还带着不少冀南纸币，又是河北武安口音，便以为他是抗日的主要干部。其他十九名群众，多是青壮年，又都是跟廉一起从白塔集跑来的（其中有我抗先队员七人），因此，敌人便怀疑都是八路军，立即将他们带到村西日寇临时指挥部所在地。中午12时左右，日伪军把二、三百名群众驱赶到村西井北六、七十米远的一片麦茬地上，在刺刀威逼下，对群众逐个盘问搜查，命令群众听他们的长官“训话”；同时把廉吉章等二十名群众押解到水井旁，有百余名日伪军围成了人墙，开始了血腥屠杀。三、四个日军推的推，拉的

拉，把廉等二十人一个个活活填到井里，遂点着井旁的麦茬扔进井内，还不时往井里打枪、扔手榴弹。最后又往井里打了两阵机枪，并把井边的五块磨扇和井口的砖填入井内。一直到下午三点左右，敌人才离开前李赵庄。这次合围，日寇不仅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血水井”惨案，还在村内外的枪杀了十二名群众，抓走了的为他们运送抢掠的财物几十人，有的至今下落不明。

6月11日下午，李金忠和伯父李佃俊在距井不远的地内压瓜，从马颊河支队的三个战士口中得知井内可能有人，便用三齿、绳子捞出了两人。一个只剩下巴没有头，后来得知是刘寺地的曹玉美；一个面部炸得血肉模糊，后知是白塔集的李帮业。掩埋在井北大坑南沿的土井里了。第三天（6月12日）一大早，村党支部书记李惠泉，武委会主任李惠昌，模范班长李金忠和井主人李亭志等多人继续捞人。当他

们用辘轳把井水绞上来后，看到井水已成了血水！井里横七竖八的尸体，痛苦挣扎的情状，惨不忍睹。李亭志下到井里，用绳子拴一个，向上提一个，又捞出了十八具尸体和半筐手榴弹壳。井周围一片凄惨景象。这些死难同胞，有的一丝不挂；有的只有上衣；有的身上有刀伤；有的头上有弹洞；有的肢体残缺；有的血肉模糊。特别是白塔集北街的段保兰，肚皮外流出一堆肠子，从井中捞出时其右手还捂着伤口，真是惨不忍视。闻讯前来认领尸体的亲属和羣众，看到自己的亲人这样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下，无不痛哭，决心为死难者复仇。

“血水井”惨案的发生，至今已四十三年了。为了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记住侵华日寇的罪行，纪念被残杀的同胞，解放后，“血水井”被列为县级重点保护文物，已成为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场所。

附：受害者名单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政治面貌
李帮教	男	53	白塔集南街	一般农民
李帮业	男	45	同上	同上
李新志	男	17	同上	青抗先队员
李盈祥	男	17	同上	同上
于文德	男	18	同上	同上
岳代成	男	18	同上	同上
王保成	男	17	同上	同上
王金顶	男	17	同上	同上
于进河	男	54	同上	一般农民
王金库	男	44	同上	一般农民
段保兰	男	25	白塔集北街	曾当过游击队员
郭长发	男	30	同上	一般农民
岳朝银	男	20	白塔集西街	一般农民
杨西瑞	男	18	白塔集西街	一般农民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政治面貌
李新起	男	18	前李赵庄	一般农民
杨玉成	男		杨赵庄	一般农民
曹玉美	男	43	刘寺地	遇难前曾当过教师
杨怀成	男	32	刘寺地	一般农民
曹保庆	男	27	刘寺地	青抗先队员
廉吉章	男	54	河北武安	中 医



血 水 井

冠县抗日游击高小始末

教育志办公室

“芦沟桥事变”不久，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县长侯光陆、教育科长李洙庭逃之夭夭。我县各级学校解散，学生被迫失学，教师自谋生路。全县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在中共冠县县委的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开展起来。为了唤起民众，扩大抗日力量，决定由于以绥（于忠）为主，创办冠县抗日游击高小。

1940年7月，抗日政府教育科长朱惠然和科员崔景深，同于以绥、吕淦泉，研究筹建抗高的具体工作。确定经费由县政府拨发，校址选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敌后根据地桑阿镇梁庄一

带。聘请了几位有教学经验的教职工，他们是：

于以绥，冠县于村人。平原乡师毕业，战前共产党员，曾任县游击营指导员。做领导工作兼任政治课。

吕淦泉，冠县田村人。担任语文、历史课，兼管行政和教材选编工作。

程殿鳌（又名程占一），冠县桑桥人。担任自然课，兼后勤工作。

许炳明，冠县谈二寨人。担任数学、地理、体育课。

郝镜堂（又名郝文生），河北馆陶县南拐渠人。担任数学课。

王翠娥，女（又名王斗镜），冠县城里人。担任音乐课，兼管女生工作。

魏兰亭，冠县张货营人。担任美术课，兼管事务工作。

李大友，冠县梁庄人。校工。

这些教职员工，在艰苦恶劣的环境里，知难而进，任劳任怨，团结战斗，为我县抗日教育事业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抗日战争年代，党的教育方针，总的精神是为政治服务，为抗日战争服务，同战争、生产、人民群众的需要密切结合。因此，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办学形式、教学方法等，都要根据这一总精神安排。特别重视学生的抗日爱国教育，培养学生的革命英雄主义。同时教育他们刻苦钻研文化知识，理论联系实际，达到学以致用。因此，对战前教材物色改选誊抄，下了不少的功夫。象语文除保留一些健康的传统课文外，自编抗日救亡、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爱国一家的文章，并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从报纸、文件、宣传材料上选摘一些资料；历史课则选编一些抗敌御侮的史实和献身祖国的民族英雄事迹，以激发爱国抗日的热

情；地理课则从地理位置、人口物产诸方面，加强学生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音乐课全部是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和一些抗日民间小调，以鼓舞学生打击敌人的斗志。总之，各科教材都为了实现抗日救国的教育方针。

抗高招收的学生，主要是热爱祖国，拥护抗日的知识青年。有战前县立一高和桑阿镇四高的毕业生、肄业生高文礼、许天德、崔冰艳、郭丰梅、赵畅、张腾华；有在农村做抗日工作的郭文江、梁学礼、杨士奇、杨士英、杨士芳；有跟随党政领导干部活动的子女，如冠县抗日政府县长王化云同志的女儿黎进；还有从抗日团体组织选送学习的，如李长松（李英）、郭金锁等。通过抗高短期培训学习，他们大部分都奔赴抗日第一线，成为抗战中坚和领导骨干。

因由抗日政府发给经费，师生都实行供给制，教师和脱产干部待遇一样，富裕时每月发二元菜金，困难时就沒有了，师生同吃、同住。教学设备十分简陋，学生自带凳子或麻扎，根本沒有校具。

1940年9月，抗高在桑阿镇梁庄正式开学。于以绥同志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县委指派共产党员李长松、郭金锁以学生身份，分别担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做师生的政治思想工作，秘密发展党组织。到1940年底，发展的党员有赵畅、梁学礼、杨士英、郭文江、宋合彩等。1941年2月，于以绥、郭金锁同志相继调离。县委又派韩凌云（韩金鼎）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宣传委员由学生赵畅担任；下半年李长松同志调离后，梁学礼任组织委员。

为便于教学和参加抗日活动，甲乙两班分

成若干小组。教师吕淦泉和许炳明分别组织领导，集体活动，分散居住，白天在屋内上课，晚上分组讨论，交流心得体会。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服务中心。

抗高另一主要任务是宣传。师生深入各村，进行讲演、教唱抗日歌曲、演唱小剧、发动群众、刷写标语、拥军优属、广造革命舆论。由于形势变化，校址不断游动。日伪扫荡时，师生便背起锅灶、口粮、黑板、携着书包麻扎转移，随遇而安，就地上课。树林、坟地、磨房、碾屋、庙堂，都是上课休息的好地方。砖头当凳，膝盖为桌，大地当纸，木棒当笔，用锅底灰做墨水写字，用石灰块当粉笔讲课。在艰苦动荡的岁月里，谁也不计个人得失，不讲求名利地位，全体师生只有一个共同的爱国思想和抗日救国的决心。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他们经常到潘庄、野场、段庄、

玉庄、务头、桑桥、白佛头、李村、轧庄、苇园、张货营、谈二寨、赵庄、阎营一带，受到广大干部好评。

抗日高小的师生，改变了旧学校束缚师生关系的陈规陋习。上课学习时，教师热情耐心，严格要求，教学相长；社会活动中能者为师，互帮互学，密切合作；日常生活上互相爱护，同甘共苦，亲如一家；战争转移时并肩作战，相互提携，舍己为人，风雨同舟。学生尊敬教师，教师爱护学生，形成了师徒加战友的新型关系。大家围着团结救国、抗战到底这个共同的目标，在实践斗争中，形成一个亲密无间、情同骨肉的战斗集体。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成为抗高的校风。

党和政府对抗日游击高小的工作都很重视。鲁西北地委宣传部肖平和县委宣传部李振舟、宋兰臣、郑旭光等经常检查抗高工作。

1941年冬，县委宣传部在贾六庄，由宋兰臣同志召集抗高学生干部中的党员赵畅、梁学礼、郭文江等开会学习党的文件，部署教育工作。冠县抗日政府教育科长朱惠然、朱广林等，对抗高关怀倍致。县财政局、公安局和县区武装部队，都为支持抗高，保护师生安全做了大量工作。1941年招生时，很多知识青年要求入校，教师徒步深入各村，对报名青年进行文化考核，也适当招收了日伪统治区的部分进步青年，两班共80人。抗高影响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

为适应抗日救亡的急需，有部分学生未毕业便分配工作，发挥了骨干作用。1942年7月，40名毕业生大部分考入冀鲁中学。

1942年秋季，滴雨未落，小麦没有种上。1943年春，依然大旱无雨，夏粮颗粒无收。加之日寇实行“三光”政策，疯狂向根据地扫荡，

齐子修等土匪伪杂乘机骚扰，桑阿镇一带饿殍载道，已成为骇人听闻的无人区。我县抗日军民进入最困难的时期。抗日部队、党政干部每天只发二两粗粮。这种情况下，抗高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于1942年8月解散。部分学生分配工作和升学，另一部分学生并入桑阿镇务头的抗日实验小学（后又改名为游击抗日高小）。因灾情日重，终于在11月停办。

1944年9月，县委决定恢复抗日高小。魏兰亭同志任校长。校址在杜赵庄。招收学生40名，附设小学一个班，就地招收小学生20人。教师有程殿鳌、吕淦泉、郝镜堂、高金营，小学教员郭丰梅。抗高恢复不久，县委派贾金岭以学生身份任抗高党支部书记，赵金贵和另一学生任支部委员。学生中的党员有杨超平、郭钦海、王凤来、王春旺等。

抗高恢复以后照旧实行供给制，生活依然

很艰苦，不少学生衣单被薄，象王宏图等同学，在严冬的夜里，只好睡在农家的灶坑里。随着抗日形势的好转和开展生产自救，师生待遇逐渐改善。教师每月发一元冀南票或45斤小米。教学秩序也较正常。为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校外活动依然很多，在宣传、除奸、瓦解日伪人员、开展减租减息、斗恶霸、反贪污等工作中，抗高学生仍是一支活跃的有生力量。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鲁西抗日根据地组织鲁西学生联合会，抗高学生赵金贵当选为联合会主席。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中，抗高的宣传队不畏艰险，机智勇敢迂回往返200多里，由冠县经八岔路一直到临清。宣传了党关于巩固抗日胜利成果、扩大根据地、建立新中国等一系列方针政策。

日寇投降不久，冠县全境解放，抗高搬入县城内一高旧址。因无校具无法上课，党支部

书记贾金岭从南馆陶焦圈地主恶霸焦汝敬家征用了部分桌凳，解决了校具的困难，

抗日战争刚结束，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对解放区狂轰滥炸。抗高又一度转到县城周围的八里庄、三里庄、代屯村。后县委、政府决定仍迁回原一高旧址（现在东街小学），名为冠县第一高级小学。

李雪亭和他的乡土教材

马子江

李雪亭（1885—1963），字庆梅。回族，山东省冠县张尹庄人。李先生早年就学于东昌府初级师范学堂，为教育救国奔波了一生，是一位在冠县教育界做出一定贡献的老民主人士。

1911年至1927年，李雪亭先生先后在冠县乙种实业小学、冠县师范讲习所、冠县一高等校执教。

1928年，李雪亭任冠县教育科督学。他廉洁奉公，精通业务，忠于职守，逐校视察。1930年，山东省教育厅指导员孙保贤来冠县视察教育时，曾以“朴实谙练，视察尽职”评价李先生。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全县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高潮。李雪亭先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先后编写了《中华开国五千年》、《起来向鬼子们的踪印追去》、《冠县二十万同胞齐奋起》等二十几首革命歌曲，在各抗日群众组织中传唱，激发了广大人民的抗战热情。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冠县县政府南逃，政局混乱，冠县教育瘫痪。1938年初，在冠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李雪亭先生在冠县文庙组建了抗日联合高小，并任校长。吸收因日寇入侵而解散失学的原一至六高的学生入校学习。他亲自编写抗日乡土教材，激发学生抗日救国的决心和信心。后来由于形势恶化，学校被迫解散，这些学生大部分走上了抗日前线，有的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有的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抗日救亡的紧急关头，李雪亭先生坚决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曾受他的学生赵健民（当时任十支队第三营营长）的委托，亲自起草了《告全县同胞抗日救国书》，呼吁全县人民迅速展开广泛的抗日救国运动。

1943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伪县大队付郭思美用高薪聘请李雪亭先生办日伪教育。他义正辞严地拒绝说：“我誓死不吃汉奸饭。”当敌人以武力威胁时，他正气凛然地说：“宁愿血流尽，节操不可污。”遂携妻孥到抗日根据地东平县许城教书。不久在东平生一子，取乳名为“东成”，学名为“建贞”，以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雪亭先生在梁辛庄高小执教。他热爱学生，精通业务，尽职尽责，教书育人，成绩卓著。

1954年，李雪亭先生慷慨捐献保存多年的

珍贵历史典籍《大清一统志》五十册，以表爱国热忱，受到冠县人民政府的嘉奖。

下边选录李雪亭先生自编的部分乡土教材：

冠县二十万同胞齐奋起

(一)

冠县地处鲁西边，
相传五千年，
人口有廿万。
全境内大平原，
各庄满人烟。

(二)

可恨日本鬼，
无端来侵占。
县城被轰炸，
老妪也受奸。

这样大耻誓要雪，
方称男子汉！

(三)

廿万同胞们，
奋起永向前。
自卫队要紧办，红枪需普遍。
不动如山岳，
动如海潮般。
打日寇、除汉奸、保国保家园。

中华开国五千年

(一)

中华开国五千年，
叠京大变乱，
不过朝代换。
芦沟桥肇事变，灭种在眼前。
这样大劫数，

历史未曾见。
馆陶失陷后，
兽兵到冠县，
到处轰炸，奸淫、掳掠同胞都看见。

(二)

兴帮人多难，
正义胜邪端。
抗战心更要坚，打破最后关。
疾风知劲草，
版荡知忠奸。
拯我水火内，
郁郁庆苍天。
杀敌立功。
保家卫国，
方为民族英雄汉！

杀退鬼子兵

抗战一发生，

大炮响连声。
战伤我弟兄，
杀退鬼子兵。
莫叫那日本鬼子来逞凶，
糟踏老百姓……糟踏老百姓。

一齐拿刀枪

文、清、山、博乡，
一齐拿刀枪。
勤上高粱地里隐藏，
等候日本鬼子过往。
猛向前，
向日本鬼子头上砍攘。
大刀跟着大刀，
长枪跟着长枪。
我们的刀枪跟赵云一样！

美国鬼子憨了脸

援朝一周年，
歼敌四十万。
勇渡鸭绿江，
追过三八线。
打的那美国鬼子憨了脸，
哑巴吃黄连。
打的那美国鬼子憨了脸，
哑巴吃黄连。

永远跟着共产党

中华开国五千年，
社会情况不一般。
旧社会里看一看，
官僚地主闹翻天。
住高楼，吃大餐，

花天酒地家常饭。
穷苦百姓不值钱，
出了多少血和汗。
生产的东两被剥削，
还受压迫命难全。
地主有名又有号，
穷人家的孩子不是叫李四就是叫张三。
努筋败力一辈子
落个“穷种”和“穷酸”。
穷占街头无人问，
社会制度是那般。
年老的同志想一想，
恐怕也要鼻子酸。
自从有了共产党，
拨开云雾见青天。
毛主席英明领头干，
一气干了三十年，

打鬼子、除汉奸；
打老蒋、夺政权。
五万万同胞齐心干，
才把那帝、官、封三座大山消灭完。
从此人民站起来，
扬眉吐气把身翻，
搞互助、闹生产，
团结战斗建家园。
永远跟着共产党，
幸福生活万万年。

征集古书

中华开国五千年，
一辈一辈传到咱，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是六亿人民的家园。
经过一代一代人的缔造，

成为举世闻名的锦绣河山。
还有汗牛充栋的“经史子集”，
二十四史就是我们的文化遗产。
三千年来蔓延流传，
中华民族文化日益发展。
只因为近百年天灾人祸，
使不少古籍文献缺而不全。
希望全县的明达人士，
在梁头上找找看，
如发现有储藏书籍慷慨捐献。

冠县回族简史

民侨宗办公室

信奉伊斯兰教的大食人，从唐朝开始进入冠县。

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创建了伊斯兰后，建立了大食国。公元651年，阿拉伯第三任哈里发、欧思曼遣使者来华通好，这是两国建交的开始。自唐朝永徽2年至贞元14年（651—798）147年间，大食国来唐使节有37次。充分证明大食国和中国唐朝已建立了亲密的邦交。

天宝14年（755年），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唐边将安禄山举兵叛乱，连陷两京。至德2年（757年）春，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唐肃宗借大食国、回纥、南蛮等国的

联军20万人，平定叛军，收复两京。安庆绪退到黄河以北邺城（今河南省安阳）为中心的周围60座城继续顽抗。唐派九节度使带兵60万，围剿安庆绪，因无主帅，指挥不统一，又因史思明屯兵魏州（今河北省大名）援助安庆绪致使唐军大败。史思明杀死安庆绪后，称大燕皇帝，出兵攻占洛阳及附近州县，后被其子史朝义杀死。上元3年（762年），唐又借大食、回纥联军，再收复洛阳，史朝义奔莫州（今河北省任丘北），后因部将田承嗣、李怀仙降唐，史朝义穷蹙自缢死。安史之乱，历时8年，战区蔓延潼关以东4个省（晋、冀、鲁、豫），战争平息后，大食人（即后来的回族）即在这4个省部分地区安家落户，冠县即有了伊斯兰教徒。

大食国带兵将领艾斯、吴艾斯、嘎新三人都在平定安史之乱时英勇战死，唐朝皇帝为这三名有战功的大食国将领在冠县城内南街东部

修建大寺一座，塑造铜像三尊，以志纪念。因伊斯兰教徒不供奉偶像，故派一些僧人住在寺内，掌管祭奠，供素不供荤。

在平定安史之乱后，大食国将领查元义、滑宗岐留居冠县，传授了查滑拳，冠县不仅是大食国人来的最早县城之一，而且也是中国著名拳术查滑拳的发源地。

冠县的回族人民，因风俗习惯与汉民不同，聚居的特点是：大分散，小集中，全县22个乡镇中，回民分布到17个乡镇，44个村庄。千人以上的村庄有张尹庄、城内西街、南街、里固七甲、里固八甲；其次是后十里铺、高庄、沙庄、四个阎村、蒋寨、南关；100人以上的回民村，多数是因经商亲属关系留居形成的。

宋景诗传略

宋景诗（1842—1871），山东省冠县甘官屯乡刘贯庄人。幼年家境很穷，学习拳棒，以武勇著名。当地农民说他卖豆腐为生。胜保说他曾在山东巡抚张亮基部下当过兵勇；还说他当过佣工，当过武教师。

1854年，太平天国第二北伐军曾连克山东莘县、冠县、临清、堂邑等州县，并在堂邑及冠县进行过两次大战。后来李开芳攻克山东高唐州，坚守十个月，终殉国于茌平冯官屯。1857年，山东捻军王方云部在金乡、钜野一带起义。1858年至1860年，安徽捻军曾六度攻入山东。

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天津。奕訢（咸丰帝）逃往热河，遂订《北京条约》。就在这一年，山东全省除登州外，其余九府二直隶州农民普遍地进行“抗纳钱漕”运动。堂邑、

馆陶、冠县一带也“分送传军”，“聚众抗粮”，遂引起农民的武装起义，宋景诗便是若干起义领袖中的一个。

宋景诗起义原因有四种传说：宋景诗因好友王占基被捕入狱，宋与友十八人劫狱后，因“官军”追捕，乃“揭竿而起”。一说：宋劫狱是为了援救雇佣他的主人白姓（白因被贪官敲诈未遂而入狱）。一说：是一批县役因宋习白莲教（？）要捕他，宋逃走后就起义的。山东农民则说：宋因参加农民的抗粮运动，被捕，农民集合十八人劫狱，救出宋来就起义了。但正式的武装暴动则在1861年（太平天国11年，即咸丰11年）3月。

山东的白莲教——即天八龙卦教军队于3月21日，首先攻克山东邱县（今居河北省）县城。同时攻打冠县、莘县、馆陶、观城、阳谷、堂邑、濮州、朝城、范县，及直隶之曲周、清河、广平等州

县，在二个月之内都前后攻克了。宋景诗自己并非白莲教徒，他率领自己的起义部队参加了白莲教军的行列。白莲教军的总首领是张善继。依八卦分军建旗。乾兑卦白旗；坤艮卦黄旗；震巽卦大绿旗及小绿旗；离卦红旗；坎卦黑旗及花旗。知名的领袖不下30人，宋景诗是其中之一，张黑旗。而张黑旗的也不仅宋景诗一人。

白莲教军先后占领山东及直隶14个州县。

“从教者如归”，其人数不下5万人。再加长枪会、“土匪”、“盐枭”等也参加战斗，人数更是“莫可数计”。东昌府一带各州县“无官无兵”，完全成了教军的统治区域。

教军攻克城池后，首先是释放狱囚，搬运粮食，烧毁仓库、武营、官廨，“寻觅官吏眷属”，“杀害泄愤”，然后出屯城外，筑壕堑固守。对于农民，令其“收附城熟麦，每斗抽二升”；宋景诗则勒令地主把所收麦谷，一半分给

佃戶，一半送给教军管理。故农民从军者日众。

教军特别是宋景诗部队的纪律最严明。

“不抢不砸”，“光要草料吃头”，“不杀百姓，不抢百姓，不采花盗柳，不胡作非为。有乱来的，就地正法。”满清官书也不得不说他“不杀人，不放火，沿途买食，尚无滋扰情事”。因此农民对于教军也是拥护的。当满清军队与教军作战时，妇女儿童用木锨扫帚扬起沙土，为教军助声势。

5月末，满清派胜保督办直隶、山东军务，由直隶向山东进攻教军。僧格林沁亦派遣西溧阿及恒龄率军会攻。自6月初至7月中，教军相继失守或放弃邱县、馆陶、冠县、堂邑、莘县、阳谷等城。其间互有胜负。教军虽遭受数次挫折，重要首领杨泰亦阵亡，而胜保军亦“死伤惨重”。7月8日胜保军攻大李王庄，被教军（包括宋景诗黑旗）两面夹击，

几覆没。11日，再以大军进攻，教军败，失大李王庄。胜保称教军“得脱者马匪二千余，步匪尽殁”，此役当有宋景诗在内。

7月19日胜保大军攻朝城，宋景诗此时驻扎朝城附近，突向胜保之部将成禄“请降”。胜保至燕店受降，编宋景诗所部为“靖东营”。

在宋景诗投降后一二日，教军2000余人出现在胜保军之后方，“自朝城张鲁集以南数十村庄”皆“张黑旗”，并自称为“投诚宋勇”。而敌后阳谷、堂邑、莘县、馆陶一带又“告警”了。胜保对这些“黑旗军”，不辨真伪。据说“即景诗亦不能辨也”。

7月21日，成禄率领宋景诗部队进攻朝城，路遇教军。满清军分布两翼，而令宋景诗迎战，宋杀教军七八十人，至朝城下，教军一交锋即奔城而走。次日继取观城，仍以宋景诗为前导。但教军于城上设旌旗而大开城门，教军先

已撤退，于是教军大队退入直隶，胜保军亦追入直隶境内，并奏称教军“多告歼灭”。但不数日后，潜伏之教军又在朝城、冠县、堂邑、馆陶一带活动了。胜保部将成禄遣使赵玉林至自称“投诚宋勇”的黑旗军中给发功牌、旗帜、军械，令他们五日后候点验，接受招抚。而赵玉林几被杀，并以进攻答复他。但不久，这些黑旗军又都在黑旗上加各色月形镶边以与宋景诗区别（宋旗黑色白月，无边）。他们在胜保军后“纷纷扰乱，忽去倏来，此击彼窜无虚日”，“聚散无定，多少莫测”。弄得胜保只好与山东巡抚谭廷襄议谋全部“招抚”。于是“各县（民团）团长、文武生监与胜营弁勇出入匪中，关说多方，行经施密”。而教军却“朝欲纳款，夜复叛逃；东则乞降，西又攻剽”。胜等“无可捉摸”，只好“按兵不动”。胜保并公告说：“有阻挠抚局，激变

降众者，军法治之！”谭廷襄也公告说：“有言降众欲叛，抚局难成者，军法治之！”胜保等之所以如此百般迁就，以求教军就“抚”，是因为此时捻军正五路围攻僧格林沁大军于山东黄河以南地区，清廷拟抽胜保之军去防御捻军之故。但在同时，在直隶的教军首领张善继及左临明为清军所掩捕，被害。不久，由山东进向直隶之教军领袖张殿甲、程五姑阵亡，张玉怀、程学书亦受伤。惟以郃洛文、苏洛坤等为首的包括红、蓝、白、黑、黄、绿各旗的教军则始终在攻击馆陶，冠县、莘县一带。教军此时已失去统一的指挥，并可能开始在分裂了。

9月初，胜保又奏称教军：“除歼灭外，余皆反正”了。但教军分布于冠县、堂邑等四县村庄者，“尚不可数计”。而此时清军均纷纷他调，胜保亦因奕訢（咸丰帝）之死，去热河。

10月，捻军大队渡黄河入范县。教军联合长枪会、“土匪”及捻军共15000人进攻濮州，范县、朝城、阳谷一带。而宋景诗此时为表示“赎罪”，“自请剿捻”，颇“获胜”。因之教军亦于夜间攻宋景诗营，宋军败。教军再攻之，宋军意见不一，不能出战。及胜保回抵山东，宋又随之进攻教军，破莘县延家营白莲教根据地。进行激烈战斗，胜保军虽伤亡惨重，但教军之损失亦大，主力似被击溃。故至12月26日，除郃洛文、苏洛坤等为首之教军“逃窜伏匿”外，张玉怀、雷凤鸣、杨朋岭、程顺书等均向胜保投降。经挑选精悍马队3000人编为四营，随胜保去“剿捻”。其余则分别遣回各县，“安插归农。”白莲教军在形式上被消灭。而宋景诗由胜保保奏“以参将用”。

1862年即清同治元年，宋景诗及雷凤鸣、程顺书、张玉怀、杨朋岭等部队被招抚收编

后，扎营在临清、馆陶及直隶大名一带。投降教军与地主武装团练间之矛盾仍然存在，“猜防乡里”，“互相仇杀”。宋景诗等都“无意南征”。并暗遣其弟景书引六七百人潜伏堂邑各村庄。谭廷襄乃“挨庄查逐”“责令归营”。2月，宋与雷、程赴河南转安徽前线，但张玉怀、杨朋岭则借口无船，粮食将尽，仍率队回山东冠县、莘县一带。清廷亦无可如何。3月，宋景诗渡河后，驻安徽太和。与捻军战，屡败。17日，宋景诗突率部队回河南陈州，联合驻陈州的雷风鸣部队开回河南省城索饷。并称“愿意归农”。因又率部东北走，拟回山东。但是直、鲁、陕、晋四省均戒备，宋不得渡河。4月，胜保又派人招回宋景诗，宋景诗乃率部回河南省城，向河南巡抚郑元善“悔罪”。郑令人带宋部回安徽。清廷遂革宋景诗参将衔，将胜保“交部议处”。7月，胜保被命赴

洛河“督剿”太平军陈得才部。宋景诗令其弟景礼及杨殿乙回堂邑，自称奉胜保命回乡招集旧部马勇赴前方。并谓：“如马给乡团，准即牵回；或已变卖，准本勇回赎。”团练大恐。此时“归农”之教军因团练寻仇杀掠不已，为自卫计，曾数度起义，但均被清军所镇压。而堂邑柳林镇永清团对镇压农民起义尤为出力。

8月，宋景诗随胜保抵河南许州，清廷继令胜保赴陕西督办军务，宋景诗又于9月初随之入陕西。自9月初至12月底，宋景诗均随胜保“剿回”《平定关陇纪略》称：宋景诗曾多次参加对回民战斗。《秦难见闻记》则称：“宋景诗为先锋。宋故捻党（？）投诚者，骁勇善战，其部下所统皆百战之余。及与回民战，兵马自相践踏，死者数万。”李静慈文（载《艺术生活》）则估计其与回民有默契，不曾交战。宋景诗在对回民作战中不肯出力，

以避免自己部队的牺牲是显然的。此时，清廷开复了宋的参将衔。

1863年1月3日，胜保被革职，并命多隆阿将其拿解进京。多隆阿将胜保之兵勇加之精简逃选，令宋景诗往三原驻扎。宋因所部有被缩漏之可能，乃于21日赴三原途中，由郃阳县露井地方率领其部队约1500人改道向东北，拟渡河回山东。此时胜保尚在郃阳就医。据说曾“责以大义”。而宋景诗则说其部下“思家念切”，仍向东北开去。一路上关隘盘查，便说是“遣撤回籍之勇”。至山西荣河县境白马渡，以银两贿外委郭亮，遂以炭船抢渡黄河而入山西。

多隆阿立刻派人追赶，满清朝廷则更为恐慌，分令直隶总督文煜、山西巡抚英桂、河南巡抚张之万“派兵截剿”，又令山东巡抚谭廷襄“堵击”，“毋令漏网”。但宋景诗由山西

径入直隶。对追赶他的人说：“兵勇都归心似箭，如果准许回籍省亲，必可再图报效。”到直隶井陘，清廷令文煜派人去利诱威胁，一面以人马堵截示威，一面用钱收买宋的马械，宋都不理。再派人去“开导”他，宋还是说：“请给假十天，好回籍省亲。”清廷只好承认宋是“急欲回籍无疑”。但“令其剿张锡珠以自赎”。宋景诗遂于2月13日由文煜派人“伴”之率领部队回到山东临清。与宋同在胜保营中的雷凤鸣在第二天也率部跟踪宋景诗之后回到临清。

原来山东白莲教军队大部被遣归农以后，其数“不下数万”。由于各县团练曾与教军为敌，教军投降后之马匹军械又为团练没收，故与团练之间的矛盾、仇恨，日益加深，遂再行揭竿而起。1862年底，山东邱县、馆陶、临清及直隶之曲周、清河、威县等处集合千余人，

部洛文、杨朋岭、张玉怀等亦各集合人马，共得五六千人。1863年1月活跃于山东堂邑、冠县、馆陶、临清及直隶之威县、曲周、清河、枣强、冀州、南宫、钜鹿、元城、广平等州县，而山东之濮州、观城、莘县、朝城、冠县之教军又纷起，马步共达万余人。宋景诗回到山东时，正是白莲教军新的领袖张锡珠领导着教军纵横驰骋于直隶南部各州县，打得直隶总督文煜走投无路，且被清廷革职充军的时候。同时，山东巡抚谭廷襄正驻兵兖州，进攻淄川刘德培的起义军，苦战不下。所以谭廷襄和新任署直隶总督崇厚都企图拉拢宋景诗，谭要调宋景诗去淄川助剿刘德培，崇厚则请调宋去直隶助剿张锡珠，宋景诗对此是“依违其间”，双方敷衍。

二三月间，张锡珠等教军先后回山东，活跃于冠县、堂邑、朝城、莘县、聊城、馆陶、

临清一带，而以冠县为中心，大军共万余人。宋景诗以“赴直隶助剿”为名，招募人马3000人。2月底，宋景诗派其部下刘厚德率马步1000人入直隶助崇厚。而由于张锡珠回军山东，东昌府知府秦际隆乃要求原拟入直隶的宋景诗大队去东昌府助“剿”。宋遂率部由临清入驻堂邑、冠县一带。从此，宋景诗对教军则取观望，而以官军旗号专心地对堂邑、冠县团练——尤其是堂邑柳林镇的永清团进行半公开性的攻击。故此后“莘、堂、冠、馆乡团畏祸”与宋军及教军互相默契了。“朝城民团”，“与匪分合，亦不可测”。惟有柳林团“为匪所欲甘心，无日不战”。所以当时地主间流传着：“柳林团能杀能战，范寨团英雄好汉，惠丰团半私半官，堠堙团熊种王八蛋，小屯团见面就散”。而宋景诗也就“堠堙不打，小屯不打，单打柳林！”3月末，活捉柳林永清团长

王百齡，5月10日又杀死其另一团长杨鸣谦。并杀王百齡。宋军此时在馆陶、堂邑一带来去自由，清军不敢干涉。

教军于3月末大胜清军后，大队回直隶。及恒齡之军追入直隶，教军又于4月初回到山东。4月10日张锡珠不幸阵亡，教军再退直隶，势力遂日趋衰落。13日张玉怀大败受伤，25日杨朋山被诱杀，同日张锡珠之子张金堂亦被擒斩。5月，教军再入山东，而满清大军如恒齡、海羣、苏克金、成保、萨萨布等骑兵亦均集中山东东昌府。刘长佑继任直隶总督，亦率军入山东。在大军压境之下，5月底杨朋岭，张玉怀被杀，教军遂逐一被消灭。宋景诗此时对教军暗中有所接济，但也曾公开对之作战（如宋之部将米登峯、薛法起曾参加擒杀张金堂之战）。而教军战败溃退时，宋景诗则每每大开营门，让败军逃入其营中。满清朝廷都深

知宋景诗这种情况，但因自己“兵力不足”，故对宋“暂为羁縻”，“以孤贼(教军)势”。

六月初，教军既被消灭，清廷乃命刘天佑督办直鲁豫剿匪事宜，专剿宋景诗。宋景诗也明白自己的处境，六七月间，集中自己的部队于临清一带，首先隔绝柳林团与清军的交通。在卫河之尖冢及运河之魏家湾之间，绵亘百余里，设卡巡警。以刘贯寨及甘官屯为大本营。于堂邑、莘县、聊城、临清四州县各村庄树立旗号，招集部众，共有马步一万余人。囤积资粮马草，挖壕筑寨。并在车营一带训练部队作战，秣马厉兵，准备战争。而满清亦集中刘长佑、恒龄、苏克金、丁宝楨、呼震、保德等大军于山东。

7月20日刘长佑、丁宝楨等还派人说服宋景诗，要他保留兵勇1500人，候点验。21日，宋景诗就抢渡运河进攻清军了。23日刘长佑分三

路攻宋营。宋将人马埋伏高粱地中，抄出敌军之后杀得刘长佑大败而回。刘又派人亲赴宋营四五次，“往返开脱，晓以利害”，想骗宋景诗去清营，宋置之不理。26日，宋景诗又以马步五、六千，“掩旗卧鼓，蛇行而进，”偷袭清营，大胜。30日恒龄率成保、萨萨布、海步等马步5000余人攻宋营。进至黎儿庄，“道路积水，尽是泥洼，高粱茂密，不见一人。”继而宋军伏兵从四面高粱中突起，恒龄大败而逃，损失惨重。从此，刘长佑与恒龄都不敢与宋再战，刘遂改变战略：只“严防窜越”，等“布置周详”以后，再用“滚营法，挨次转转前进。将附近高粱全行砍伐，期逼贼巢而止”。于是刘长佑就“坐拥重兵，拖延不进”，一直到后来9月中僧格林沁来山东会剿，他才“过河扎营”，但“尚距贼巢40里”。

在战争开始以后，特别在八九月里，宋景

诗军同时又连续不断地（在十次以上）攻打柳林镇及范寨。战斗惨烈，柳林镇“仅得勿陷”，并将柳林圩外熟禾二百余亩收获而去。

9月13日，僧格林沁率领军至清平魏湾，刘长佑亦移营临清河南，夹攻宋景诗。21日，僧格林沁令苏克金，恒龄等由柳林镇分路出兵。宋放弃赵家、塔头阵营。22日僧格林沁围甘官屯、刘贯庄。鏖战终日，僧军势几不支，僧再以洋枪队进攻。宋见压力太大，乃放弃甘官屯，退守刘贯庄。僧格林沁乃构筑长圩围困宋景诗。宋乃下战表给僧格林沁说：“我是良民被逼，听说亲王来，本当‘授首’。但听说亲王用兵如神，而尚未领教。今天打了一天，也很平常，不过以人多势众欺人而已。请退至战场，明天再鏖战一天。如果胜我，就甘心受死了！”僧格林沁见表大笑，说：“黑小子们不够垫我马蹄子的！”把军队退后一些，准备

明天会战。宋景诗便命令在圩子上遍插旌旗，三更造饭，四更对敌，准备打仗，一面又命令全村人带起东西走。僧格林沁见圩子上明灯亮烛，又听见一片锣鼓之声，却不见宋景诗的兵出来。等到天明跑近一看，仅存空寨。僧格林沁大怒，派苏克金等追赶二十余里，而宋军伏兵突起，又把苏克金杀得大败而逃，副都统成保且被活捉。

但宋景诗感到敌人的强大，乃率军疾行往南，入直隶经过河南再回直隶，在武邑又缴获刘长佑的饷银二万两，又由德州回山东。他兜了几个圈子，转得满清军队“无从捉摸”。到10月11日，突然又挺进到堂邑来攻打柳林镇。但这次因清军有备，柳林未打下，而损失甚重。于是再走直隶、经河南兜了个圈子又回到直隶。但其部下分散，被清军歼灭不少。至10月19日，据说宋景诗仅率200余人由小濮州乘

商船五艘入大清河。21日仅余数人遁走东平、平阴、东阿交界之丛山中。

宋军失败后，东昌、临清各州县及团练长挨庄搜捕宋党。宋景诗之母、妻妾及宋军战士之眷属二千余人均被捕杀。宋景诗之母且被钉在东昌府城门上活活钉死。各地农民土地被没收的共约千余顷。

宋景诗失败后，清廷虽随时追问其下落，而无结果。直到1865年4月，太平军与捻军联合军遵王赖文光、罗王张宗禹、鲁王任柱等大军由河南转战进入山东时，清廷又问：“是否有宋景诗在内？”而据刘长佑奏：宋景诗果然随大军回了山东，并且还在扬言说：“要回堂邑向柳林团报仇！”清廷大为恐慌。5月，赖文光，张宗禹及宋景诗等率领大军由河南到山东，进入江苏再回到山东曹州府，绕了几个圈子，引得在后追赶的僧格林沁人乏马疲。联军

到曹州的黄河边上，联合郟城以北的人民武装共数十万人，设下天罗地网，等候僧格林沁，而佯作战败渡河。僧格林沁果然率军追至，伏兵齐起，将之重重包围在曹州高楼寨，突围不得。联军乃杀僧格林沁及内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鳌等。僧军溃散殆尽，所有辎重武器，均被缴获，而马匹尤多。联军威声大振。但宋景诗比次并未回堂邑，又随联军东征助战而去。

1868年——同治7年，太平军与捻军联合部队被消灭。宋景诗独自一人流落江湖，改名许连生，往来归、徐、陈、亳之间，卖技授徒。二年后，即1870年，为安徽巡抚英翰所遣之总兵牛师韩等及叛徒黄宗孟所侦获。黄宗孟先与宋往来款洽，告以寿州亳州之间，尚有捻党不少，可集合滋事。宋信以为真，与黄皆行至亳州，黄以酒灌醉宋景诗，牛师韩等缚之解至安徽省城。1871年3月，清廷命“就地正法”，

宋景诗遂在安徽牺牲。

此件系1952年陈白尘教授率“宋景诗调查组”调查整理的。由南京市政协副主席司洛路同志珍藏多年，1984年5月转交县志办公室张怀轩同志。



武训与崇贤义塾

郝 瑞 琛

武训（1838——1896），原名武七，山东省冠县柳林镇武家庄人。幼年家贫，无力上学读书；壮年因不识字，受人讹诈凌辱，深感穷人失学之苦。遂矢志兴办义学；他刻苦积累，以其历年行乞所得，于1888年在柳林镇首创崇贤义塾；1890年又在馆陶县创办杨二庄（现属临清市）义塾；1896年，再在临清创办御史巷义塾。他毕生致力于兴学事业，劳瘁成疾，于光绪22年4月23日去世，享年58岁。

武家庄在冠县城东北60里，过去是个不过百户的穷村庄。他父亲武宗禹，母亲崔氏，哥哥叫武让，共四口人。武训七岁时，父亲病故。那时哥哥尚未成人，一家生活全靠母亲做针线，拾破烂，替富家做零工度日。后来哥哥已大，能帮工了，但收入甚微，仍不能养活别人。母亲只好带着武训外出讨饭。

武训生性纯正，待母至孝，从来不叫母亲生气。长大卖力得点工钱，就到市上买点好的食物，或讨得了可口的东西，总要拿回家去孝敬母亲，从不自己受用。纵然如此，他母亲终因乞讨为生，无力治病，过早地死了。

十五六岁的武训经伯母多次托人引荐，到邻村薛店庄张举人家做长工。张为富不仁，对待武训如同牛马。武训给他干了三年活，因伯母病了，向张举人要支工钱，他却捧出一本伪帐，指着白纸上的黑字，说某月某日支取了

几百文，某月某日支用了几十文……，总计三年工钱早支完了。这样假造帐目，公开的讹诈，武训听来简直是晴天霹雳！但也别无他法，他悲愤地指着张举人说：“一个人要凭良心！”武训实在忍受不了，大吵大闹起来。后来张也无法下台，恼羞成怒，于是反诬武训要讹赖他，命他的狗腿子把武训打得遍体鳞伤，拖到村外的泥坑里。

含冤莫伸的武训躺在泥坑中一边哭，一边寻思：这个社会黑白是非无法辩白，这个世界完全属于有钱有势能识字的人。不识字的穷人，只有被践踏在人家脚下，一辈子也不能抬头。从此他更深地感到贫穷子弟失学之苦，便决心兴办义学，使穷孩子们不花钱就可以读书。于是他拿起铜勺、背起褡袋，从这村跑到那村，从本县跑到邻县，一边沿门乞讨，一边口口声声要办义学，让穷苦子弟念书。他唱道：

“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修义学积攒基金，什么苦行他都干。就是他的头发也是只剃左边留右边，以此怪相取怜于人。他唱道：

“左边剃，右边留，修个义学不犯愁。”

从薛店到柳林镇，从柳林镇又到塔头村，凡堂邑、馆陶、临清等县，大小村庄都有他的足迹，男女老少都与他熟识。

武训不仅帮工、行乞，为人干各种脏累杂活，还拣拾破布败絮。他利用多种废物，制出绳线绒球等，卖给别人，人们也都争着买他的。这项收入与帮工、乞讨所得不相上下。这就为修办义学增加了资金来源。武训对行乞讨饭生活也很乐观，他信心百倍地唱道：

“结线头，缠线蛋，早晚修个义学院。”

他会两手撑地，全身倒竖起来，做“立

鼎”，他说：

“竖一个，一个钱，竖十个，十个钱，竖的多，钱也多，谁说不能修义学？”

甚而他吃“五毒”（即蛇、蝎、蚰蜒等毒虫），以引逗人们喜乐。总之，凡是引人兴趣，叫人出钱的事，再吃苦他也干。凡做这类表演时就说：

“吃蝎子，吃蝎子，修个义学我的事。”

“蛇可食，不要怕，修个义学全在我自家。”

“破砖碎瓦可消化，若不修义学，才惹人笑话。”

由于他抱着一个专一至诚修义学的志愿，时时记着念着，所以他不嫌污秽，不惜身体，他吃苦卖力受辱换来的钱，分文也不随便花用。他自己经常吃的即是霉烂的粗粝，菜根、地瓜蒂等等。在讨要的食物中，只要有比较好

点的，就卖给别的穷苦人。他说：

“吃杂物，能挡饭，省钱修个义学院。”

同治初年，武训的积攒已数目可观。他扒土坑、找墙洞，统统匿藏起来。后来有人告诉他放帐生息的办法，他心里很高兴。听说馆陶县娄塔头村（现属临清市）武进士娄俊岭和娄松岭两人经营商业，家中富有，为人好义。便去求见他们，恳托他们代为存放生息。娄俊岭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武训喜不自胜。便把多年积蓄的五、六千串钱，并加上变卖三亩田地的120千，全数送到娄俊岭家存放生息。几年后积至四千余缗。这时他开始买地，他觉得买地收租比放帐生息牢靠。以后他买的土地，有的自己经手，有的别人代买，都交给娄氏兄弟管理。

武训闻知堂邑县进士杨树芳，为人比较正直。他又求杨，代为设法筹办义学。杨树芳当

时十分惊喜，满口答应下来。此后，只要积满一串，就去交给杨树芳。这样添钱，长利滚息、收租，再加不断买地，到光绪12年，已共拥有土地230亩，合京钱4263吊，外存现款2800吊。杨树芳向堂邑县知县汇报了这个情况，知县郭春煦也以为是千古奇事，愿加赞助。

武训在他本村武家庄曾买一处房宅，打算兴建义学。因房子太小，决意放弃。他恳求郭春煦和杨树芳出面另选地基。柳林镇郭芳、穆官云两人，自愿捐助业地各一处，共300余亩，作为建筑校舍之用。在杨树芳、娄俊岭等人的参与支持下，组成校董会。于1888年（清光绪14年）动工修建，校址座落在柳林镇东门外，建筑瓦房20余间，大门二门各一座，四周筑以围墙，院内栽植垂柳杨树，共计开支建造费京钱4370余吊。除武训存放在杨树芳等处现钱2800吊，还缺少1570吊。此数暂由郭杨二人设

法塾出，以后武训奔走广大村镇，再求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以偿还这一缺额。武训的230亩土地，每年租利370吊，则全数拨作义学基金。义学里的塾师由郭、杨聘请。应聘的有寿张县孝廉崔准，聊城进士顾仲安，博平孝廉曹连枝，清河拔贡滕绣封、贾品重等都在义学中充任主讲。教师虽已请好，但学生却不甚踊跃。原因是富户人家多半自己设有家塾，不愿到义学里来；贫苦子弟则又为生活所迫无力就学。于是，武训又分别到贫寒人家去跪求，请父兄们送其子弟到义学读书。这样才把义学创办起来，取名柳林崇贤义塾。学生分为两班，一是蒙班，学童30余人，由监生某任教。一是经班，学生20余人，由孝廉崔准主讲。一切就绪，学屋洋溢着吟诵之声。这事传播开来，村民争相传颂。

义学兴修起来之后，武训心里自然高兴。但仍旧奔走行乞。所不同者，各地百姓已经渐

渐另眼相待，尊他为义人，不忍再雇用他代替牛马做工；同时他也不再做竖鼎、吃毒、吃污秽霉烂的东西了。他后来的收入，仍然交给杨树芳经理，以充实义学的基金。逢朔望节日，他就到柳林义塾去探望，跪求塾师严于执教，敦促学生勤奋学习。先生学生谁也不敢怠惰，学风之佳，冠绝一时。崇贤义塾创办几年后，学生大为增多。邻县的生童，数十里路去上学。生童增至70人，蒙童增至50人，共百余名。每科岁考，学生入泮补廪不下一二十人，其盛况前未曾有。

武训50岁后，杨树芳说：“你年过半百啦，愿望实现啦，不必再去乞讨啦。要紧的是娶一妻子，将来子孙繁衍，百年后你有个根，也算不枉劳苦一生。”他表示：我活一天，就办一天义学，这个心愿是永远不变的。我不娶媳妇，积蓄的钱都由我做主；若是娶了亲又生

了儿子，一家衣食用度，必然妨碍办义学的事情，这事万万不能遵命”。他说：

“不要老婆不要孩，专修义学为生涯。”

“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

1890年，馆陶县有个了证和尚，因受武训的感化，也在杨二庄筹建义学。武训特意跑去，将230千钱送给了他，又创办了第二所义学。

当时，山东巡抚张曜，了解了武训的义行，特下示传见。武训背着破褡裢步行到济南晋谒。进入帅府，便坐在廊檐下台阶上，一边结着线，一边和巡抚问答。张十分敬重，捐送他一笔钱，又赐以黄布铃印的缘簿，并劝他遍求各府州县以及书院在上面加盖印铃，以作信符，使他易于募化。同时又奏请清廷给他建造一个“乐善好施”的牌坊。武训的名声由此而震动四方。

光绪17年，武训去临清讨饭。钞关街绅士施善政听说后，把他请到家中。武训当即恳托他和临清绅士商议，在该地筹建义学。施善政约请了冯长泰等耆绅，用银500两，在御史巷买了一所房宅，加以修葺添造。另外拨出库平银600两，交由冯长泰承管行息，为义学经费之开支。当时聘请的塾师是临清县贡生王丕显，该人笃实好义，办学有方。临清义塾，根基日固，其规模成效可与柳林义学媲美。

武训积蓄之多，自己无力掌管。于是，让祖孙武茂林代为记帐。茂林忠厚老实，武训十分器重。族亲见他日益发财，且能任用族人，都来接近于他，巴结于他。尤其他的哥哥武让，屡欲在他跟前，沾点好处。他常说：

“我积钱，我买田，修个义学为贫寒。”

“不顾亲，不顾故，义学我修好几处。”

有一次，堂邑县知事郭春煦请武训到县衙

吃饭，又提起娶亲的事，劝他接受忠言。但武训为添办义塾，对家小伦理，非常淡视。当时，他对郭春煦又滑稽地唱了一首歌：

“人生70古来稀，53岁不娶妻，亲戚朋友断个净，临死落个义学症。”

他对亲戚族人以及他自己是这样，但对各地孤寡赤贫，却解囊相助，乐予周济。当他得知冠县张八寨村张春和之妻陈氏以割股孝敬婆母后，毅然赠给陈氏10亩良田，叫她养老养亲。这10亩赠田，遂致远近轰传。有人问他为何这样慷慨，他说：

“这人好，这人好，给他10亩还嫌少；这人孝，这人孝，给他10亩好养老。”

武训流浪漂泊30多年，不会吃一餐好饭，不会穿一件好衣，更不会睡一夜暖和床铺，辛苦奔波，求讨不息。一个人不是铜筋铁骨，哪里经得住这样长期的折磨？光绪22年4月，他

终于病倒在临清义塾的檐廊下，经治无效，于4月23日病逝。享年58岁。武训死后，堂邑、冠县、馆陶不少乡民极端悲痛。绅董会商由武让的儿子武克信迎丧归葬，安葬在崇贤义塾院内东侧。立碑、刊志，由山东新任巡抚袁树勋奏请朝廷将其生平宣付国史馆立传。后来还专为他建了祠堂，以示纪念。

武训兴学业绩，久为中外教育、文化界所钦敬。《清史稿》、《饮冰室文集》均载有专章。后人崇其风范，以武训为名的学校，相继兴办，仅国内著名的就有：堂邑私立武训中学；陶行知创办的上海武训补习学校；董必武同志亲笔题文的上海武训学校；冯玉祥将军在泰山开办的武训小学；绥、沪、陕、豫、京等7省市共计大中小学25处。1937年，武训纪念祠和武训义学会进行增修和扩建。1943年，我党为纪念武训，曾将堂邑县改称武训县。1945年

10月，冀南行署又在柳林武训义学的基础上创办了著名的武训师范学校。这所学校至1962年，共培养学生2915名，有139名成为区县级以上干部，24名成为地级以上干部，3名成为教授、副教授，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

1951年，电影《武训传》公开上映后，江青来武训故乡进行调查，1951年8月，抛出所谓《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时间，批判武训运动在全国展开，全盘否定了武训的历史功绩，柳林武训师范被撤销，各省市武训学校均为此易名。“文革”十年动乱期间，对武训的批判登峰造极，武训其人竟遭掘墓分尸，武训义学遗址相继被毁，是非颠倒，损失惨重。

粉碎“四人帮”后，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群众不约而同自发地搞起纪念武训的民间活动。《武训先生故居》（吴作人书）、《武

训先生之墓》（徐运北书），两方碑刻和《武训纪念堂》匾额及武训画像（伍必端教授作）、塑像（曾竹韶教授作）等从北京、济南运到武训故乡，供广大羣众瞻仰。1985年9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大会上，对批判电影《武训传》作出否定的评价。指出当时那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是非常粗暴的。1986年4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问题的批复》一文中指出：武训其人，过去大加挾伐是错误的。最好在彻底查清当时指责各项问题的基础上限于地方范围内处理。

为武训恢复名誉，肯定武训办学精神，不仅是对武训这一历史遗案作出公正的结论，而且；对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重大的意义。



崇贤义塾旧址

的问题，还是经费。武先生看出文盲的需要教育，与饿丐的需要饮食一样。而普通人，虽有以馀食施饿丐，却不肯以馀钱助教育，这是一种近视的习惯。武先生利用这种习惯，乃以饿丐需要教育者的象征，以饿丐所得馀食与馀钱为教育经费的象征。积历年乞食之所得足以办三义学而有馀，可见筹款不算很难，而筹款的人要能如武先生的刻苦而诚恳，是不容易得的。武先生似乎对我们说：你们不要再说教育经费难筹了，只要你们能刻苦而诚恳就好了！这是武先生提醒我们的。

貧困，哪有金錢辦學塾，教育清寒子弟們。

武先生一壁去乞食，一壁自沉吟：將來若要興學塾，此刻先須積聚基本金。從此乞錢更努力，遭人侮辱情難忍。每日只費兩個錢买个馒头囫圇吞。忍辛耐苦兩三載，果然積了六千文。

堂邑有个某富翁，丰衣足食冠四隣。武先生走到富翁家，跪在门前不起身，门仆呵喝也不去，声称要见贵主人，富翁当他是疯子，门外哀号如不闻。武先生跪了六日夜，富翁才来问原因，武先生貌温顺，语诚恳：“小人有钱六千文，要托贵人谋子金。”贵人心肠善，殷肯助孤贫。富翁口答应，心评论，乞丐居然能储蓄，节俭精神无与伦。富翁既允许，武训喜万分，只要积满一千钱，立刻送进富翁门。十多年，一转瞬，本银生利息，利息做本银，总数达到百千文。

武先生，创学塾，不逡巡。租借古庙几间屋，粉刷门棧气象新。学生招集贫家子，教师聘请宿学人。有人见他是乞丐，故意推诿不就任。武先生跪地不起身，使他不能不承认。

开学日，尤殷勤，备酒菜，宴佳宾。教师坐着席，陪伴有乡绅，有人见他是乞丐，坐着不食也不饮。武先生又是跪地不起身，使他不能不沾唇。

逢朔望，进塾门，遇见教师能尽职，打躬屈膝谢辛勤。遇见学生不好学，跪地劝诫诚本本。因此教师学生都感愧，讲习哪得不谨慎。

可是武先生，仍然乞食储钱文。他到八十岁，创设学塾三十多，教育子弟千余人。有的就工商，有的去耕耘，他们衣食都无虑，只有先生还苦辛。路上相见心不忍，齐来迎养报深恩，武先生不允准，并对大众说：“但原养我志，何须养我身”。

读武训公乞食兴学传

千里书

来乞表扬，
地灵人杰
武家庄。百
年庠序功臣
训，一代文
章作者梁。

饮冰室集有
武公记传

岂以卑微
轻半缕，终
教弦诵遍三
乡。从知托

千里書美乞食興學傳
家莊百有餘年庠序功臣訓一代文
章作者梁
輕半縷終教弦誦遍三鄉從
知托鉢吹簫侶都是忠肝義俠腸

甲戌夏

郁達夫

鉢吹簫侶，都是忠肝義俠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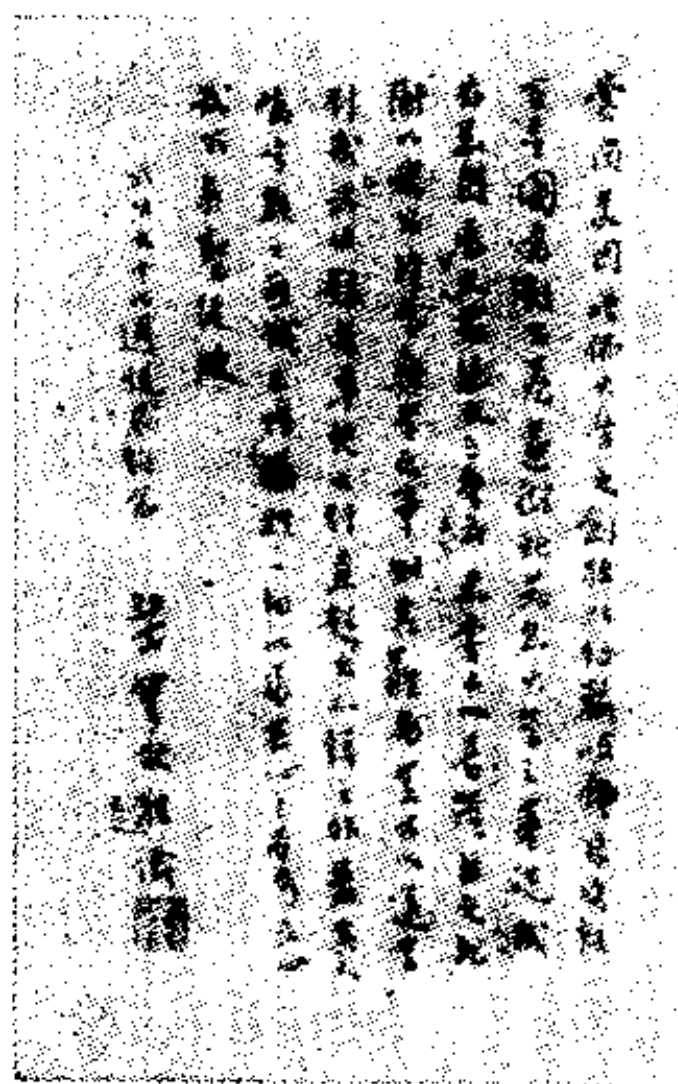
甲戌夏

郁達夫

学兴三邑创于丐，凌驾英豪秩冠益。原宏直欲移海山，志笃竟忘在沟浍。乞得锱铢归蓄储，拚教冻馁委塵壒。舍己济羣行已难，为国树人见尤大。卧薪尝胆勾践贤，彼为复仇弄狡狴。吞炭漆身豫让侠，彼为报友故狼狽。席地幕天仅一身，世事何预公利害。发愤纵由耻自愚，食垢终钦甘久奈。易钱全恃线结成，积金俨向沙淘汰。筹策需才复跼求，卅载艰辛心始泰。堂邑馆陶与临清，庠序居然皆蔚荟。如是缔造千古稀，悬此观感百世赖。功圆形蜕鲁人怀，貌鬼神奇李叟绘。人世瞬经九七春，崇报允开追祝会。不朽孰与垂万年，泰山如砺济如带。

桐乡陆费逵初稿

尝闻美国哈佛大学之创始者约翰哈佛，斥



资数百金，图书数百卷，遂树此著名大学之基础，成为美国历史最悠久之学府，未尝不以奇迹目之。然衡以武公行乞兴学之事，则其难易岂可以道里计哉。武公艰苦卓绝之行，直超出

人情之外，盖其人富宣教之热诚，不惜牺牲一切，以求其心之所安，是心武公，其圣徒欤。

武公九十七周年诞辰纪念

梁实秋敬识

回忆我父亲——查拳名师张英振

中央歌舞团张铜霞



先父张英振，号俊卿，是我国全能武术家。精通十八般兵器，尤以祖传查拳独步武林。二十年代名冠鲁西，三十年代声震吴越，四十年代誉满巴蜀。解放后，为武术事业的发展培养

了大批优秀人才。他是一位身手不凡，德高艺精，驰名中外，贡献卓著的查拳名师。

我家祖籍山东冠县张尹庄。父亲生于1896年农历3月18日。听我父亲讲，我的家庭是查

拳世家，代代习武。尊查密尔为查拳创始人。查密尔以后，继承其拳艺的近代名家有沙亮、张乾、张坤诸人。张乾老人武功造诣颇深，在鲁西一带极享盛名。他的得意传人是张其维，既是我父亲的堂伯，也是我父亲的师父。张其维一生练武，功力深厚，特别是铁砂掌，动作迅猛机巧，数十人莫想近身。张其维的高徒很多；张锡彦、张锡泰、张英贵、张广治、张风岭、常振芳、李健刚、张英健等名家皆出其门下。

我父亲虽然出生在查拳世家，却练功稍晚，这是因为我爷爷张锡奎患有严重的癫痫，生计艰难。父亲从小就为地主家打短工、当更夫养家糊口。据我父亲说：那时一家人连肚子都不能吃饱，哪有工夫练武。有一次，他到地里割草，割到姓常的一家地主的地里，他硬说我父亲偷了他地里的庄稼，不由分说，揪住辫子就打，打得我父亲眼冒金星，脖子转

了筋。这可气恼了爷爷，爷爷去找地主拼命，堵着他家门口骂了半天，地主关上大门，没敢露头。因为那次受人欺侮，张乾、张其维二位老人才决意让我父亲练功。这是1908年的事，父亲已年满12岁。

查拳是北方回族的传统拳种，弹腿是它的基本功。弹有十路，腿法讲究弹、踢、踹、扫、勾、挂、缠、点、擦、拐、扑、踩。父亲的开手拳就是弹腿，爷爷张其维每天盯着父亲踢弹腿，不得少于三百次。后来在亲友的资助下，家境有了好转。父亲被送到一家私塾念书，离家二里地，每天踢着弹腿上学、下学，二年来，从未间断过一天。

以后父亲的功课又加码了，爷爷张其维要求他每天三更天早起练功，踢弹腿时，每条腿要绑三斤重的沙袋，仍旧不得少于三百腿。苦练几个月后，父亲的腿功已非常人能比了，用

手摸时，坚硬似铁，踢出腿来，力有千斤，走起路来，快疾如风。

冬春之时，地里没活，父亲就专门练拳，由于风大，他在坡地上挖个一丈来深的大坑，每天凌晨进去锻炼，晚间有时点上油灯或借着月光，一直练到深夜。

父亲抱着全盘继承祖传拳术的决心，细心琢磨十路弹腿的不同要点，经过几个春秋的艰苦锻炼，他的一招一式功架齐整，他的一步一腿合乎规矩，爷爷张其维每逢看他练过一个时辰，汗水涔涔，总是说：“有出息，有出息。”

父亲常对我讲，张其维爷爷是一位严师，他教徒弟宁缺勿滥，宁可少教，要你学精。让父亲足足踢了两年半的弹腿，才开始教套路。查拳十路，而是先教第四路，第四路乃是查拳的母拳，其他套路都由此派生而出。张其维爷

爷告诉父亲说：“练不好这趟拳，休想往下学。”

原来，第四路拳的创编还有纪念伊斯兰教艾卜·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阿里这四大哈里发（穆罕默德逝世后相继执掌教政的四位继任者）的含义，足见这套拳在查拳中的地位。如今社会流传的四路查拳，就是这套拳。

父亲在练拳的同时还练站桩，查拳的桩法叫作“汤瓶式”。汤瓶，是穆斯林做礼拜前小净的器具。净身表示信仰的虔诚。穆斯林经商也常把汤瓶的图案绘制在牌匾上，赋予它“至清至真”的含义。这汤瓶式，在查拳中的动作则是：一手拄腰，如同汤瓶把，一手呈掌形前伸，如同汤瓶嘴；头正顶天，如同汤瓶盖；工整的马步，笔直的身形，如同汤瓶肚。它表示信仰至诚。从练功角度来讲，强调长时间站这种汤瓶式桩，可大长功夫。

父亲用三年时间尽学查拳套路、器械、对练、以及流传在当地的洪拳、炮拳、腿拳、滑拳。在他十八、九岁的时候，爷爷才开始教他查拳的攻守之道。查拳的技击方法，有十字要诀，即是缩、小、绵、软、巧、错、速、硬、脆、滑。并将技法一一拆讲、把招数一一传授。父亲日夜操练，反复揣摩，认真记忆，终于精确地掌握了“十字要诀”，并运用的出神入化。

那时泰安古庙常有香火大会，张其维爷爷不顾古稀高龄，百里遥远，常带徒弟去泰安庙会演武。鲁西人多闻张其维的大名，观众总是围得水泄不通。一到那时，父亲就成了登场的主角。他练出的查拳，动作勇猛刚劲，身法矫捷雄健，手法神速清晰。特别是查拳中的龙、虎、蛇、鹤、猴五形，他体现得最好：时隐时现，变化万端似蛟龙；勇猛善扑，俯坐纵跃如

猛虎；折叠盘转，曲伸仰翻若游蛇；动静相间，耐久稳健象仙鹤；灵活轻便，窜蹦闪展同猿猴。赢得观众啧啧称赞，不断鼓掌，竟相传告：张其维又带出了一个高徒张英振。

当时泰安三中校长是个热心武术事业的人。后来竟主动请求张其维爷爷要聘请父亲到三中教武术，从此我父亲凭着两年私塾的资历，十年练武的功底迈进了泰安三中。年方二十一岁的父亲在该校教学相长度过了九个春秋。

当时山东镇守使马良，很喜欢武术。一次，他招集许多武林高手到济南比武，在演武场上，父亲的一趟查拳，一趟查枪，震惊四座，再一过手，势如破竹，锐不可挡，更显身手不凡。马良见了，喜上眉梢，遂一道令下，调父亲到济南，任省府武术教习。

在泰安三中以及在省府任教期间，父亲多

次登泰山，找老和尚，以武会友，互相交流，切磋技艺。从而丰富了自己的本领。

1928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举办武术国考，全国武林高手汇集南京。山东派出数人，其中便有我父亲。当时他有一只眼正害严重眼病，用纱布蒙着。不少关心他的人劝他放弃比赛。父亲觉得国考是全国武林高手云集的大会，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即便亏输，也落个见世面，开眼界。

那次比赛除了演练拳术、器械套路之外，还要打擂。在擂台赛中规定不许戳目、扼喉、踢下阴；三场两胜为胜，臀部着地，自愿认输或受伤不能再战为负。当时参加比赛的有三四百人，到打擂时只剩下一百多人了。大会用抽签的方法分组捉对，我父亲与江南名手岳某分在一组。岳某虎背熊腰，极有功力，比赛成绩一直不错，态度傲慢。他得知与山东张英振对

奎，又看到我父亲个子比他矮一头，又蒙着一只眼，便有些看不起。便轻慢地说：“你是张英振吗？我就是岳某。”父亲答道：“有幸相识，我们以武会友，点到为止吧。”岳某不可一世地说：“我非把你揍扁不可！”说着还攥着拳头在父亲脸前乱晃，拳头都快触到父亲的鼻尖。旁观者大惊，担心二人会在台下动武起来，父亲对这突如其来的轻侮付之一笑，拱手道：“好，好，好。”这一切不仅被各路选手看在眼里，而且还被大会主持人张之江看到了。他十分惊奇地说：“张英振真有涵养。”

比赛那天，擂台前人山人海，因为都听到了岳某侮辱父亲的言语，不少人认为他二人定在擂台上决一死战。轮到他二人上场时，场内鸦雀无声，裁判员手铃一响，两人从左右分别上场。父亲左摇右晃突突几步到了场中，一个“英雄较艺战当场”的架式立在岳某面前。岳

某突然举起右手表示认输。顿时场内大哗，裁判员更是莫名其妙，便问我父亲是否同意，父亲不允。岳某无奈，只得应战。二人一交手，父亲出手勇猛激烈，招招逼紧，岳某连连招架，两三回合便退至台口。观众们为岳某捏一把汗，若是父亲飞起一脚，岳某不死即伤。可是父亲没有用查拳弹腿绝技，仅是进身挤乱岳某的步法，然后伸出左手一个崩拳直奔岳某肋下，岳某躲闪不及，失去重心，扑通一声倒在台上，场上掌声四起。

比赛之后，很多人赞扬我父亲有心德、口德、手德。岳某又专门拜访了我父亲，他说：

“我一见你出的步子，就知道你不是一般练武之人，必有家传奥妙，所以临阵胆怯，当场认输。”原来父亲上场这几步包括了查、滑、腿、洪、炮五种拳的步法，叫做“走风摆尾式”，能使对方看不清门户，无从下手，不及

近身，方寸已乱。父亲说岳某一眼能看出习武者的功夫高低也算得是武林高人。事后父亲因眼疾住院，岳某特地登门探望，二人遂成相知，分手后还常有书信往来。

国考结束公布了名次。父亲跻身最优等十五名中的前五名，发奖大会上授于“优胜纪念”锦旗一面；冯玉祥赠送“救国源泉”锦旗一面；大会特制道德剑一柄，上镌：“张英振同志优胜纪念，术德兼重，文武兼修。冯玉祥赠，中华民国十七年”。大会主持人张之江在授剑时说：“张英振除了获最优等奖之外，特嘉奖他一把剑，作为他的品德奖。人在血气方刚的年龄，拳头部要揍到脸上了，却以笑待之，这一笑实属不易啊！”

父亲在南京国考之后英名大振，被当时的中央国术馆聘为一等教授。

在国术馆期间，他广泛寻师访友，丰富学

识，提高自己的技艺。除学习其他流派的拳术、器械之外，还学习了西洋拳击。练习拳击那阵子，每天早晨和当时有名的“朱氏四杰”中的老三朱国祯一起练。每天练下来吃饭都张不开口，用小勺往嘴里送饭。他终于在国术馆内部拳击比赛中获得第一名。

在国术馆期间，父亲多次参加武术比赛，在与日本、蒙古等几十名外国武术家的交手中，百战百胜，轰动国内外武坛，为中华民族争了光。当时美国好莱坞米高梅公司来中国拍摄介绍中国武术的电影，我父亲与王子平合练“双手带进枪”，为中国武术走向世界迈出了先行的一步。在国术馆的几十年里共获奖章、奖旗、兵器等上百样奖品。为祖国培养了大批武术人才。现任中国武协副主席的著名拳王蒋浩泉，昆明体院教授何福生，武汉体育学院院长温敬铭等都是父亲早年的学生。

父亲在国术馆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早已破裂，军校已变成国民党的内战工具。我父亲虽然武术方面造诣精深，但对于政治、军事不懂，只是为了生计去军校教武术。虽身陷污泥，倒也洁身自好，对学校实行法西斯教育很反感，时常为学员受体罚与官长争吵。为此父亲得到学员的尊敬，都说他功夫好、心肠好。

父亲在军校任教期间，遇上了“七·七事变”，日寇大规模侵华。父亲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便想利用武术激发人们的抗日热情，于是他在南京国术馆技术室主编了可用岳飞《满江红》的词调、配合的一套拳和一套剑，定名叫《满江红拳》、《满江红剑》。其中“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数句的动作编排，气魄雄伟，难度很大，成为套路的高潮。这套拳和剑先后在国术馆和军校中教授，接着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在举国要求抗日

的声浪中，它激励人们“驱逐鞑虏、直捣黄龙”，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38年，军校西迁，我们一家也都到了成都。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父亲愈来愈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特别是国民党的假抗日真反共，更使他感到呆在军校前途渺茫。他终于毅然决然地辞去了武术教官的职务。以后，父亲在成都一家军用被服厂谋了个差使。1949年，解放大军进军大西南的时候，他随被服厂起义，投向了光明。

1953年父亲在成都办起了回民水饺馆，1958年公私合营成为职工。1963年退休。

父亲在军校从八期任教到二十期，不少向他学过武术的学员后来都成了国民党军队中的中高级军官，有些人现在还在台湾军队中担任要职。父亲每想起往事，总是感慨万分，回忆当年与学员共同练功的情景，盼望祖国早日统

一，在有生之年与军校出身的学员们团聚。原中央国术馆某学员在对台湾同胞的广播中，曾替父亲表达过他的这种心愿。

父亲入川以后，收了一些徒弟，在成都青羊宫擂台赛中拳打名将“朱贯锤”的郭涛就是其中之一。

解放以后，父亲致力于武术的保健养生，他把很多精力放在帮助病号锻炼身体方面，辅导他们练习太极拳，帮助病人提高身体素质，使一些患结核，肝炎、神经衰弱、以至中风不语病人恢复了健康。

父亲的一生，从事武术事业七十年。在那风风雨雨的漫长岁月里，在那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一贯坚持天下武林是一家，取各家之长，补自家之短的宗旨，坚持勤学苦练，不断进取，对查拳的继承发展，以致中华民族的武术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音容笑

貌，武德、武风，一直激励着后人。

父亲热爱祖国，热爱武术的心是赤诚的。就是在受冲击的十年浩劫中也没有停止过工作。他和弟子彭清贤编写了《查拳概况》；和外孙胡奉宪整理了《五路查拳》、《八路查拳》；还组织弟子们编写了《查拳诗词歌谱论》；创编了集中查、滑、腿、洪、炮五种拳法精华的《中和拳》。一些尚未遗失的祖传拳谱也都一一糊裱，字字订正。他期望有一天能将这些贡献给国家。

1962年，海灯法师曾慕名专程到成都拜会父亲，二人做了长时间友好的谈话，对中华武术的发展，进行了探讨。

1963年，上海武术大师王子平专门派女婿吴承德去成都向父亲学习“中平枪”、“六路炮”、“青平剑”三种器械。当父亲听到吴承德说这三种器械在上海已基本失传时，自己能

将这些绝技传授于世，心情无比欣慰。

1973年5月，父亲在其徒弟襄助下，去太原与查拳高手张锡泰会见，交流了中华武术，历时两月，受到太原武术界的热烈欢迎。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心情舒畅，他决心抓紧整理资料，著书立说，要在有生之年对中华武术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没想到1977年农历8月初10，一场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一代著名拳师溘然而逝了，享年81岁。安葬于成都北郊凤凰山回民公墓。

他临终时，还念念不忘祖国早日统一，武术事业兴旺发展。

1983年6月，日本著名武术家松田隆智率领武术代表团来华学习交流，赠送国家体委的《图说中国武术史》和《查拳世家正宗——张英振》两书，专门介绍了父亲的生平业绩以及

对查拳的继承、创造和发展。现保存在中国图书馆。

1984年，《体育报》以名为《查拳名师张英振》的文章，连载六篇，对父亲的一生作了详细介绍。

1986年《中华传奇》杂志第二期在《一代武宗》这篇文章里，记有罗成立带徒弟温敬铭（武汉体育学院教授）向我父亲学查拳的故事。

中国《武术大词典》对父亲的事迹也作了专门介绍。

敬爱的父亲，离开人世已十年了。祖国的今天呈现了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国家对人民的健康，对武术事业的发展极为重视。北京体委从1983年就开始了冠县查拳的挖掘、整理工作，对他的生前友好都作了调查、访问，对他们的论著、遗物做了广泛的搜集，对他的一

生也做了公正的评价。我们兄弟姐妹，无不衷心感谢党的英明。

敬爱的父亲，如有在天之灵，看到遍开祖国大地的武术之花，看到竞相涌现的武坛新秀，他老人家一定会含笑九泉。

（吕德书协助整理）

一曲《颂升平》 欢表老人心

政协办公室

管世楫，字渡生，本县潘庄人。文革前是县人大代表，政府委员。第一届、第二届政协常委。1900年生，1925年山东公立矿业专科学校肄业。自1928年开始，先后任城关一高教习，桑阿镇高小校长，女子高小校长，临清女师教师，青岛四方中学、冠县柳林师范、贾镇中学教师。1962年退休（后转离休）。执教三十余年，教过很多学生，有的成为我党、政、军的领导干部，有的为了民族的解放英勇献身。赵健民、丹彤、朱惠然、田坡、马景汉、朱介子、洪林、王振凡、钱立勋、张堃、孙立民等皆为其中之佼佼者。

我年二十余，伴读县城巾。
同学百余人，多数是豪英。
转眼十年后，头角露崢嶸：
或为三军帅，屡建国际功；
或为编辑者，文坛声铮铮；
或为艺术花，驰誉在丹青；
其他难尽述，总之都有名。
突然妖风起，昏霾气味腥。
魑魅魍魉多，四个吃人精。
耿耿忠心汉，诬以叛逆名。
非刑折磨下，九死仅一生。
横行二十载，流毒遍国境。
否极则泰来，天使（见史记）降毒龙。
一朝被粉碎，日月重光明。
来信对我说，羣英会于京。
故知他乡见，其乐难形容。
恨我气力衰，只可到郊垌。

路远不能去，欢聚在一庭。

执笔做俚歌，千里颂升平。

渡生

一九七九年秋末书于冠氏县潘庄

希光曾以手稿寄我珍藏经年，近接来示应健民同志之请，索以转赠，自当从命，且恭录于此，以志不忘。

又录管老师旧作一首：

几度见诗诗尽好，及见诗余少于诗；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此吾师改杨敬之诗嘱希光转赠，以代手覆者。盖杨曾以忆师友及水调歌头小词呈教八旬老人，艰于执笔，借此相勉，感甚、惭甚，因记之。

一九八四年八月七日岁在甲子初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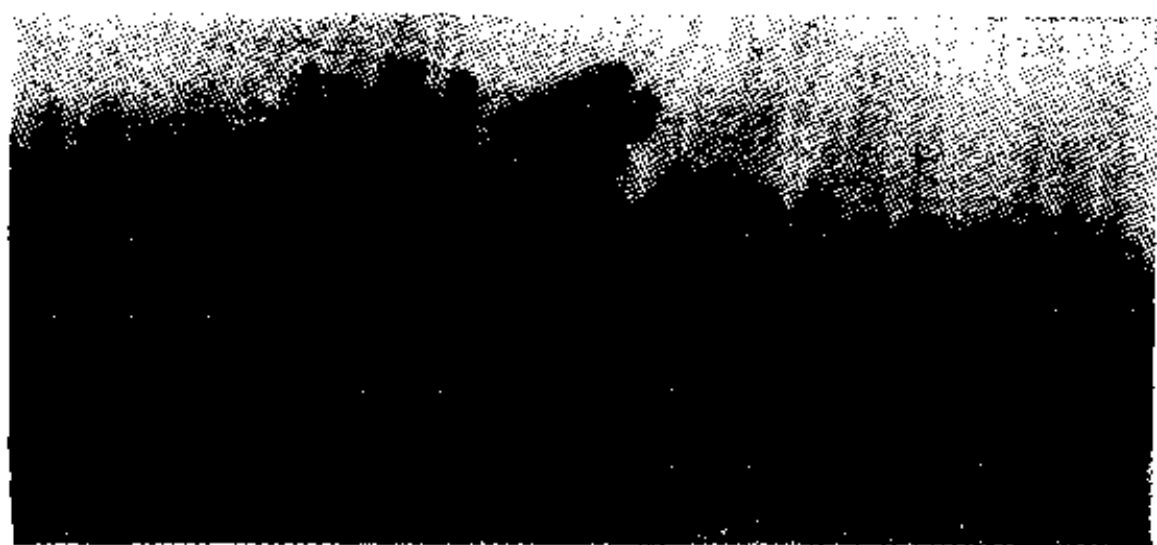
鲁西北归来书于长沙

朱惠然书于思平友谊之室

漫话肖城

韩正居

肖城，位于冠县北陶镇东南五里许的卫河东岸，是一座保存比较完好的军马古城。虽然它不为世人瞩目，既没有“山海”，“嘉峪”二关那样地势险要，造型宏伟，鬼斧神工，更不象古都长安汴梁那样名震遐迩，历史悠久，招徕无数观光探胜的游人、墨客。但是在我们祖国的史册上，它却占有着重要的一页。著名的“澶渊之盟”即由此城一战而达成的。



肖城一角

乾隆元年《山东通志》以及《馆陶县志》都有同样的记载：“肖城（又名古城），在县东南五里（指北馆陶旧县城），宋景德元年，辽主殂，肖太后摄国事，率其弟挾览侵澶渊（即河北省大名县城），筑城于此。时寇准请帝幸澶渊。挾览方布陈，城上（宋方）遣床子弩射杀之。辽人大挫，清盟而退。垒址尚存，城周围十余里，高三丈，四门具存，有二将台。”又据《宋史》、《辽史》记载以及城内遗址中发现的明代隆庆年间山西按察司杨师震墓志铭中得知，此城乃辽国肖太后为了同宋朝作战而建，故取名肖城。1004年冬，在闻名历史的“澶渊之役”中，“习知军政”的肖太后，“亲御戎车，指麾三军，赏罚信明，将士用命”，长驱中原，利用肖城这一进可攻、退可守的前线营垒，“直犯贝（清河县）、魏（魏县）、中外震惊”，此时，宋朝名臣寇准

不畏于辽邦的强大势力，力排朝内王钦若、陈尧叟等人逃跑主张的干扰，请真宗御驾亲征，亲临澶渊。一时官兵士气大振，誓与敌人血战到底，夺回失地。那时杨延昭也上言：“契丹击澶渊，去北境千余里，凡有剽掠，率在马上，人马具乏，虽众易败。“并率精锐之师”威虜军，败辽兵，破肖城。是役本可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收复失去的大好河山。但过惯享乐腐化的真宗皇帝不思进取，厌倦戎马奔波，竟答应辽方请和要求，订立了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每年宋向辽贡岁币银十万两，锦绢二十万匹。虽换来了近四十年较安定的生活，却在历史史册中写下了屈辱的一页。

如果今日有兴登临肖城，即便是阳春三月，绿树映辉，油菜黄花遍地，当你站到十三米高的城墙之上，环顾肖城内外，仍不免有那“战马啸啸，金镞飞鸣”、“寒光照铁衣”

之感。此城是正方形，每边近三华里，四面城门都是双门，而又都是扭头式。城门附近以及城角各处，都有箭楼遗迹。城内那两丈多高的土崖，曾是肖太后检兵阅马的点将台。原来的七十二眼水井，尚存大半，显然是当时为千军万马饮息而开掘的。同时，又从发现的战马骨架和多井但又很少见瓦砾的情况判断，更加证明了这座城是军用遗址的可靠性。现存城墙的厚度，底部十六米，上部八米，每夯土层均为十三公分。虽是土城，但很坚固。从各种战备设施和各种防御工事的相互配合上看，在这千里无垠的大平原上，就当时的战争条件，的确算是一座易守难攻的重要营垒。

沿着城墙，来到城西南角外的“万人坑”旁，还能依稀看到点点白骨——这是肖太后“杀人问罪”的地方，在这两军交刃战争激烈的最前线，那些被捕获的一批批俘虏和因反抗征

丁、要粮而被抓来的百姓，都是辽封建统治者的刀下鬼。不难想象，在那动乱的年月，人民遭此兵劫，死难者何止万千！

今天的肖城，虽然仅存颓垣断壁，但对于分析和认识宋辽战争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却是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

喜闻乐看的民间剧种——蛤蟆喻

周月歧 邱东山

在桑阿镇周围一些村庄，随时都可听到一种特殊韵味的戏曲唱腔，它就是流行在这一带的一个地方剧种——“蛤蟆喻”。

“蛤蟆喻”源于卫河西岸的河北省武安县一带，原名“武安落腔”，五十年前，南乐县有个叫孙和顺的讨饭人，因为会唱这种戏，被留在魏辛庄落了户。每到农闲时，人们便自动组织起来让他教戏。春节过后，四乡演出，以自演自娱。由于它乡土味浓，通俗易懂，好唱好学，深受人们欢迎。从而，蛤蟆喻这一来自异乡的民间戏曲，接受了当地风土的驯化，逐渐形成它自己的艺术特色。后来在苇园、小张

庄、桑阿镇等许多村庄广泛的流传。因而，在这一代久有“桑阿镇，多水坑，大人小孩蛤蟆喻”的谐语。

蛤蟆喻之所以受欢迎，是它的乐器独特，唱腔耐听。伴奏主弦乐器琴鼓，是用椿树挖成的，粘桐木薄板，上配尺余长的琴担和两根丝弦及马尾弓。这些物料简便易寻，农民很易制造。由于椿根木质松软，发出的音韵浑厚悦耳，喻声喻气，又加在唱腔的小过门中“5·1”两音反复出现，故闭目听来酷似雨后蛙鸣，清脆圆润，十分动听。

该剧种板式有慢板、二八、流水、另有挑莲娃娃腔、赞子等，根据唱词的感情配合使用。由于它是流传在基层的民间艺术，所以经常演出的剧目都是《吕蒙正赶斋》、《王子龙掉印》一类的生旦言情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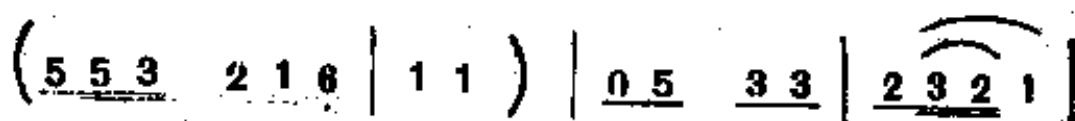
解放前，蛤蟆喻剧种尽管在人民群众中深

受欢迎，但统治阶级不屑一顾，认为它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乡土小调。1958年，挖掘古老剧种，蛤蟆嗡这枝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才得到重视。文化部门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整理加工，使它以崭新的姿容出现在艺术舞台上。1959年元月，蛤蟆嗡的现代戏《故事出在棉鞋里》和《逛公社》等剧目，被推荐到省城济南，向省级领导作了汇报演出，得到较高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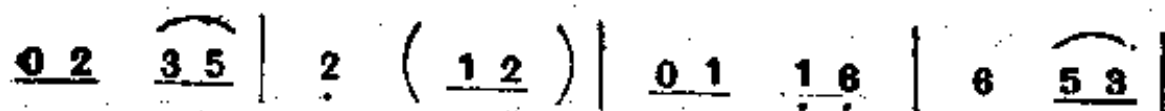
下面介绍几首蛤蟆嗡主要板式，以飨读者。

吕蒙正赶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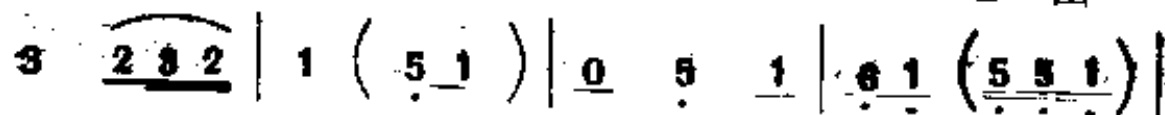
1=F $\frac{2}{4}$ (二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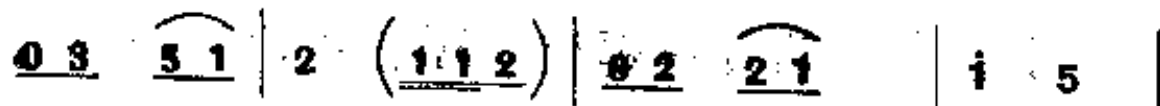
前 门里 赶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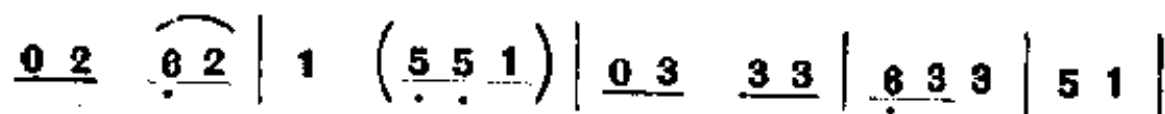
吕 蒙 正, 后 门里 赶出



刘 瑞 莲。 荣 华 富 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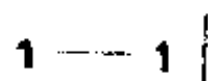
而 不 享, 偏 偏(要) 嫁 于



要 饭 郎。 儿 本 是 相 府 里 千 斤



女 儿, 爱 贫 寒, 父 丢 脸



皮。

故事出在棉鞋里

1 = F $\frac{2}{4}$ (二板)

(5 5 6 6 5 | 1235 1 4 | 5 4 2123 | 1⁶ 1 1)

0 5 6 | 1 1 | 0 3 3 1 | 2 (1 1 2) | 0 1 1 5 |
老汉 今年 五 十 七, 俺 老伴

6 5 4 | 4 5 3 2 | 1 (55 1) | 0 1 5 | 1 1 | 0 | 3 |
与 我 同 岁 的。 儿 子 参 军 在 部

2 (112 | 0 1 1 6 | 6 5 4 | 5 3 3 2 6 |
队, 不 断 传 来 前 方 的 好 消

1 (5 1) | 0 6 1 | 1 5 6 | 0 1 3 | 2 (112) |
息。 儿 媳 在 队 里, 当 干 部,

0 1 6 1 | 6 5 4 | 5 3 2 1 6 | 1 — 1 |
学 科 学, 育 粮 种, 是 第 一。

冠县政协文史资料

研究委员会征集史料提纲

为搞好我县的文史资料征集和编纂工作，特拟定征集提纲如下：

一、政治方面：包括行政机构的设置沿革，党政团体、政法、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的统战、侨务等重大历史事件，组织人事，生产状况和人民生活条件的沿变等资料。

二、军事方面：包括各时期的兵事制度、活动、驻军情况、团防装备、人民武装的建立及发展，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斗资料、军事文献、文物等资料。

三、经济方面：包括农、林、牧、付、渔业、手工业、电业、机械、水利、商业、交通、邮电、财贸金融、工商管理、物价货币，

及人民生活等资料。

四、文教、科技、体育、卫生方面：包括文化发展情况，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中等专业教育、业余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广播、民间曲艺、民间结社、武术体育、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等资料。

五、历史文物、革命文物及光辉文献：包括烈士英名录、文书档案、法令年鉴、图书文物、剧本照片、碑文拓片、名人书画、族谱墓志、乡规民约、题词匾额、名人轶事、遗稿及历史古迹等资料。

六、重大历史事件和有影响的人物：包括在我县发生的重大事件。如义和团斗争、武训办学、宋景诗起义、齐子修制造无人区、日寇大扫荡、著名战斗、群众运动、革命先烈、英雄人物、学者专家、能工巧匠，对人民危害极大的土匪恶霸、敌伪顽杂等史料。

七、风俗民情方面：包括民族宗教，婚丧嫁娶、礼节仪式、风俗习惯、建筑、服饰、方言、谚语、民谣传说、奇闻轶事等资料。

八、自然方面：包括自然资源、特产及早、涝、风、雹、虫、疫、地震，严重的自然灾害等资料。

来稿请寄山东省冠县政协办公室。务必写清姓名、工作单位及详细通讯地址。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冠县文史资料 · · 第一辑

作者 =

页数 = 2 2 1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